

王國維《曲錄》考論

梁 帥*

提 要

《曲錄》是王國維（1877-1927）進入戲曲研究後的第一部專著，此書更是在近代戲曲目錄發展中具有標舉意義。提振戲曲在中國文學的地位，是王國維自介入戲曲研究伊始便肩負起的使命。這不僅使其戲曲研究帶有強烈的文學本位色彩，還促使他嘗試構建中國古典戲曲話語體系。為此，王國維將曲史線索的鉤稽與藝術風貌的闡釋，隱匿在《曲錄》的編纂與論證系統中。從《曲錄》的「初稿本」到「定稿本」，王國維作了一系列文本重塑工作，如著錄範圍的擴大、編目參照文本的替換、作家著錄順序的調整、細目著錄項的豐富等，以使《曲錄》成為一部自然呈現的客觀化、序列化「曲史」。《曲錄》與王國維的詞學研究有著密切關係，特別是王國維有關「意境」的闡論，成為《曲錄》論說古典戲曲審美趣味的理論支點。《曲錄》在王國維詞曲研究的進程中具有重要學術意義，亦對民國戲曲目錄的發展起到率先垂範作用，評點、輯補、接續《曲錄》也成為民國戲曲目錄學重要現象，這亦加速了《曲錄》的經典化。

關鍵詞：《曲錄》、「有造於中國文學」、編纂過程、「意境」、接受史

本文於 109.09.15 收稿，110.06.16 審查通過。

* 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2106_(73).0005

A Study of Wang Guo-wei's *Qǔlu*

Liang, Shuai*

Abstract

Qǔlu is the first monograph written by Wang Guo-wei (1877-1927) after he began the study of Chinese opera,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opera's catalogue. It is Wang's mission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opera in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he started to study opera, which not only made his study of opera have some literature-centered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prompted him to try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lassical opera.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Wang combined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artistic features, and conceals them beneath the compilation and argumentation system of *Qǔlu*. From the first edition to final draft, Wang Guo-wei has done a series of text reconstruction work, such a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description, replacing the reference text, adjusting the order of writers, and enriching the detailed catalogue and bibliography, etc. Based on these works, *Qǔlu* has been naturally presented as an objective and serialized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opera. *Qǔlu*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Wang Guo-wei's study of Ci, especially his explanation of the "ideorealm" which has become the theoretical fulcrum of *Qǔlu*'s discussion on the aesthetic taste of classical opera. *Qǔlu* has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Wang Guo-wei's study on Ci and Qǔ, and also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opera's catalogu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ent, supple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Qǔlu* as important phenomena during this period also accelerate the classicalization of *Qǔlu*.

Keywords: *Qǔlu*, "Beneficial to Chines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ideorealm, history of recep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王國維《曲錄》考論*

梁 帥

一、引 言

目錄之學，標舉綱目，總攝要籍，為「學中第一緊要事」，¹但戲曲目錄則遲至清末才漸趨完備。明清時人多視戲曲為小道末技，縱使有鍾嗣成《錄鬼簿》、朱權《太和正音譜》諸書載錄作家，品評劇目，但時人多不屬意於此。其他如呂天成《曲品》、祁彪佳《遠山堂曲品》、無名氏《傳奇彙考》等，更以稿鈔本流佈，深藏篋中，鮮為人知。與此同時，私人藏書家亦不以曲籍為收藏重心：「世之好書者絕少，好書而及詞曲者尤少。」²曲本因而在私藏書目中難覓蹤跡。官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設詞曲類，但著錄的只有寥寥數部。逮至清末民初，曲學漸興，丁丙（1832-1899）、繆荃孫（1844-1919）、劉世珩（1874-1926）、董康（1867-1948）等多措意於此。³他們或刊佈戲曲目錄，或召舉同仁編纂曲目。然論及對後世戲曲目錄之影響，還是首推王國維《曲

* 本文是 2020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宗室戲曲活動研究」之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CZW016）。本文承三位匿名審查先生惠賜卓見，以助修訂，謹致謝忱。

¹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

² 清·黃丕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跋》，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第 7 冊，頁 398。

³ 南京圖書館藏丁氏八千卷樓本《傳奇彙考》鈔本，為 1914 年古今書屋影印八卷本《傳奇彙考》之底本；上海圖書館藏繆荃孫所編《樂府考略》稿本，為盛宣懷藏三十二卷內府鈔本《樂府考略》之目錄；劉世珩請王國維校讀《錄鬼簿》、《曲品》、《新傳奇品》，後將其收錄於《暖紅室彙刻傳劇》；此後，董康又組織王國維、吳梅、陳乃乾等人編校《曲海總目提要》。

錄》。

宣統元年（1909）十月《曲錄》出版，該書是王國維涉足戲曲研究的第一部專書，其與《宋元戲曲考》一道至今嘉惠學林已有百餘年：「創治《宋元戲曲史》，搜述《曲錄》，使樂劇成為專門之學。斯二者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度終無以度越其範圍。」⁴《曲錄》在王國維生前曾出版三次，即宣統元年（1909）沈宗畸（1857-1926）《晨風閣叢書》所收六卷本（簡稱「晨風閣本」）；1921年陳乃乾（1896-1971）《曲苑》所收兩卷本（簡稱「曲苑本」）；至1925年，陳乃乾再次將「晨風閣本」刷印。此外，在2003年中國書店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和2008年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上，還先後出現了兩卷本、六卷本的《曲錄》稿本（簡稱「初稿本」與「定稿本」）。⁵上海圖書館則藏有劉世珩玉海堂鈔本《曲錄》（簡稱「玉海堂鈔本」），此本是「曲苑本」所據之底本。《曲錄》問世之後，長期以來被用作研治戲曲的案頭必備工具書，朱希祖（1879-1944）、鄭振鐸（1898-1958）、吳梅（1884-1939）、陳乃乾等不僅批校有《曲錄》，馬廉《《曲錄》初補》、任訥《《曲錄》初補》、朱希祖《續《曲錄》》、孫楷第《《曲錄》新編》等更是搜輯整理，力圖匡補《曲錄》。

新世紀以來苗懷明、倪莉、王瑜瑜、杜海軍、朱夏君等圍繞《曲錄》的著錄方式、編纂思想，以及《曲錄》於戲曲文獻學的貢獻作了富有成就的考察。從戲曲專科目錄角度看，《曲錄》似無再作深究的價值。⁶不過伴隨《曲錄》相關稿鈔本陸續復現於學界，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隨之顯現出來。學界對「曲

⁴ 梁啟超：〈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序〉，《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年4月），頁1。

⁵ 韋力：〈《曲錄》、《詞錄》——落槌價令人發瘋的王國維手稿本〉，《失書記·得書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5-62。

⁶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看苗懷明：《二十世紀戲曲文獻學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倪莉：《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綜論》（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王瑜瑜：《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杜海軍：《中國古典戲曲目錄發展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朱夏君：《二十世紀昆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

苑本」鮮有關注，親所寓目「初稿本」、「定稿本」的學者又少之有少，「玉海堂鈔本」更未見提及，所以對《曲錄》的編纂過程多是語焉不詳。尤其是在梳理《曲錄》諸版本差異的基礎上，探討王國維在戲曲研究起步階段時的曲學觀念進階與蛻變，乃至《曲錄》對靜安之後研治戲曲的方法論指導意義，學界也幾未涉獵。《曲錄》上承《詞錄》而來，《人間詞話》更伴隨《曲錄》的早期編纂，故《曲錄》與王國維的詞學研究當有著深刻學術因緣。摩挲《曲錄》稿鈔本，以考察《曲錄》編纂過程為核心，再下探《曲錄》評點與接受，這無論是對梳理王國維詞曲研究的學術進境，還是考察近代古典戲曲目錄轉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二、《曲錄》編纂之學術背景

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王國維發表〈文學小言〉，闡釋了自己的文學觀。他認為文學有其獨立價值，真正的文學應沒有功利目的：「餽餽的文學絕非真正之文學也。」⁷小說、戲曲便被王國維視為是真正之文學。他講道「戲曲小說家為專門之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為職業也」，「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而「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以文學為職業，餽餽的文學也」。⁸在〈文學小言〉中，王國維為小說、戲曲正名，並使二者獲得「真正之文學」的崇高地位，戲曲、小說家也被冠以「專門之詩人」。然而又如王國維所擔憂：「詞曲一道，前人視為末伎，不復蒐討，遂使一代文獻之名，沈晦者且數百年。」⁹縱使其認為戲曲是真正的文學，但自古文人便視戲曲為小道，想要扭轉其卑下的地位顯然不能靠一時口舌之快。

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也就是在編纂「初稿本」的前一年，王國維

⁷ 王國維：〈文學小言〉，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冊，頁92。

⁸ 同前註，頁97。

⁹ 王國維：〈庚辛之間讀書記〉，《王國維全集》，第2冊，頁450。

發表〈三十自序〉。在序言中，王國維不僅反思既往的學術研究，還首次流露出欲提振戲曲於中國文學中地位的想法：

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人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¹⁰

王國維認為「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在與西方戲劇相比，「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早先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也曾將中西方戲劇進行比較，古典戲曲可謂相形見绌：「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此則後此文學家之責矣。」¹¹此時靜安尚未能理解古典戲曲的詩性特徵，因而用敘事特徵作為標尺來衡量中西戲劇差異，這未免有失公允。故儘管此時的王國維將提升戲曲於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視為學術使命，但對於從何入手，他並沒有考慮成熟。

這種游離不定在〈三十自序〉中還有表現。王國維在此序中吐露了研治詞學的心得，文辭中多洋溢著自信：「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¹²但當他用近三倍的篇幅一袒有心於曲學時，話語中更多的是惴惴不安，與有其心而力不足的無奈：「詞之於戲曲，一抒情，一敘事，其性質既異，其難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後者乎？」¹³所以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9）七月《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詞錄》相繼完稿後，王國維才著手「初稿本」的編寫。兩個月後，他為自己「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視黃氏之目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補者補之」的成績感到頗為興奮。¹⁴很快，他便將「初稿本」交付羅振玉，預備請劉世珩刊印出版。但即便是「初稿本」

¹⁰ 王國維：〈三十自序〉，《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22。

¹¹ 王國維：〈文學小言〉。

¹² 王國維：〈三十自序〉。

¹³ 同前註。

¹⁴ 王國維：〈曲錄·自序〉，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頁369。

大體摸排了劇目文獻，其按時間順序臚列作家的體例也初步反映了古典戲曲的演進脈絡；不過相比於最初「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的學術擔當，¹⁵多少還是有些不副。書稿很快被王國維索回。

至「定稿本」內有一篇王國維所撰〈曲錄自序〉，該序既未收入《海寧王忠愍公遺書》，也不見於諸版本的《王國維全集》，是王氏一篇重要佚文，茲將序文逐錄如下：

余既錄宋金以後之戲曲，得三千有餘種，乃喟然歎曰：「鈞是物也，或尊為文學之冠冕，或貶為遊戲之末途，豈不異哉！」我國文學中之最不幸者，莫戲曲若。正史藝文志及《四庫總目》既不著錄，海內藏書家亦罕蒐集。數百年間，其亡佚漸減者，何可勝道。昔明李中麓作〈張小山小令·序〉，謂：「明初諸王之國，必以雜劇千七百本資遣之。」然甯獻王權撰《太和正音譜》，所錄雜劇僅五百餘種，與元鍾嗣成《錄鬼簿》所載，大略相同。則中麓千七百本之說，殆不可信矣。然此五百餘種，固無恙也。逮萬歷間，臧懋循刻《元曲選》時，假之黃州劉廷伯者，僅二百五十種（見《靜志居詩話》），而臧氏所刊又止百種。此外明刊總集，如《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盛明雜劇》等，今皆絕不可觀。且《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中所刊元劇，除其與《元曲選》複出者，所增亦不過數種。即令此二書尚存，今日元曲之存者，亦不過百十種耳。再此後藏書家之以藏曲著者，則有淡生堂祁氏、述古堂錢氏，錢氏所藏雜劇，至三百四十餘種（見《也是園書目》）。其宋元本書後歸江陰季氏，唯戲曲不知何屬。淡生堂之書，則明亂時悉載至雲門山寺，唯遺元明以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散套不與焉，朱竹垞猶及見之（見《靜志居詩話》卷十六，今《淡生堂書目》僅載小令套數十餘種耳）。其後雲門山寺之書，半歸餘姚黃太沖先生，半歸石門呂留良，而此八百餘部者，不知流落何所矣。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

¹⁵ 王國維：〈三十自序〉，《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22。

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並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時總其事者為江都黃文暘，今其目之載於《揚州畫舫錄》者，自元明至國朝，共約千種。且入內府後，存佚亦不可知，什一之存，唏其僅矣。不揣固陋，甄錄古人曲本之不可見於紀載者，並攷作者姓氏爵里，旁及本事，都為六卷。共得三千餘種，篋中所藏，尚不逮其十分之一，聊以資蒐討之助云爾。世之君子有慕祁淡生、述古之風者乎？其有造于中國文學者豈淺鮮也。

宣統改元春三月海寧王國維自序¹⁶

相較於「晨風閣本」、「曲苑本」序言，王國維在此序著重論及「我國文學中之最不幸者，莫戲曲若」，這與早先的〈三十自序〉相呼應。他舉「藏書家之以藏曲著者，則有淡生堂祁氏、述古堂錢氏」，希冀後世有仰慕祁承燦（1563-1628）、錢曾（1629-1701）之遺風者當繼續深耕於曲學，如此方是「我中國文學止之大幸也」。¹⁷為了在文體上以示鄭重，兩個月後王國維又以駢文重新擬定〈曲錄自序〉，語言整飭流麗，形式對偶工整，是為「晨風閣本」序言。

王國維以爬梳、整理史料作為戲曲研究的門徑，但其學術思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均為中國文學，並一直飽有強烈的學術使命意識與擔當精神。¹⁸至「晨風閣本」出版，王國維提振戲曲於中國文學地位的努力得到初步確認：「《曲錄》及《戲曲考原》蒐采宏富，為以前未有之佳著，有裨於文學界不少。」¹⁹

《曲錄》欲振興戲曲於文學史地位的努力也激勵了此後學者紛紛致力於戲曲目錄的編纂，如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序〉：「方今文學振興，戲曲列入國學專

¹⁶ 王國維：〈曲錄·序言〉，稿本，宣統元年三月。

¹⁷ 同前註。王國維之後又將「此我中國文學上之大幸也」，改為「其有造于中國文學者豈淺鮮也」。對於此篇序，筆者首先譯出初稿，後又請中山大學黃仕忠先生代為複核。

¹⁸ 彭玉平總結：「開啟風氣、注重文獻、創立學科這種懸格甚高的學術理念，在其早年專攻德國古典哲學之時即已完全具備。後期學術領域雖屢有轉移，但此一理念，實伴隨其一生而未嘗改變。」見彭氏：〈王國維《詞錄》考論〉，《文學遺產》2010年第4期（2010年7月），頁103-117。

¹⁹ 〈晨風閣叢書第一集出售啟〉，《國學萃編》第20期（1909年10月），頁1。

科，莘莘學子，不可無典麗之鉅製以資考鏡。」²⁰ 傅惜華〈綴玉軒藏曲志·序〉亦言：「吾國戲曲，昔以託體稍卑，久為士林所棄。視同小道，難語大雅，鬱堙沈晦，未能昌明。」²¹ 一改古典戲曲在中國文學中被人鄙夷的學術地位，明確古典戲曲的獨特價值，這成為戲曲學人共同的學術理想。在學界尚缺乏對作家、劇作等基本材料把握與了解的前提下，全面、細緻地對古典戲曲進行整理編目就顯得尤為緊迫，民國戲曲目錄便起到了開荒拓璞之功勞。

三、《曲錄》文本的擬定與重塑

自光緒三十四年（1908）秋擬定至宣統元年（1909）秋正式出版，《曲錄》經歷了三個編纂階段。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至當年八月是《曲錄》的初創期，王國維完成「初稿本」。此本後交羅振玉，並由羅氏聯絡劉世珩預備出版：「《曲錄》二卷，假自羅叔蘊學部，為王靜庵校正。底本倩陳叔美照錄，老魏線裱。光緒戊申十月初五記，蔥石所鈔書。」²² 是為「玉海堂鈔本」。然而作為一部具有補白意義、需要花費大量精力編寫的著作，《曲錄》確屬「藉手雅林，不克集事」，²³ 絕非能夠在短短兩月內即可完成。「初稿本」遲遲沒能出版，其原因正是王國維察覺到了其粗疏，隨之不禁惕息自若，主動將其索回。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至宣統元年（1909）三月，《曲錄》由兩卷增補為六卷。王國維首先是在「初稿本」上校改，之後再謄錄成「定稿本」。這

²⁰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序〉，《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

²¹ 傅惜華：〈綴玉軒藏曲志·序〉，《綴玉軒藏曲志》（北平：傅惜華鉛印本，1934年），頁1。

²² 劉世珩：〈曲錄·跋〉，玉海堂鈔本，上海圖書館藏。「老魏」即劉世珩玉海堂的刻工魏小溪：「魏小溪，亦陶子麟夥友，黃岡人，在劉聚卿處影寫宋版書。」劉承幹：《求恕齋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第6冊，頁428。

²³ 〈吳昌綬致王國維〉，馬奔騰主編：《王國維未刊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77。

是《曲錄》內容擴增的時期，也是王國維調整全書體例的關鍵階段。宣統元年（1909）三月至五月，書稿完成最終修訂，再經羅振玉交付沈宗畸。「初稿本」載錄劇目「二千二百二十本」，「定稿本」則「三千有奇」。²⁴考慮到「定稿本」卷一「宋金雜劇院本」據《南村輟耕錄》、《武林舊事》、《也是園書目》增補劇目達五百八十六種，故早在光緒三十四年（1909）秋，王國維實際就已完成對《曲錄》所涉劇日文獻的基本摸排。至於「玉海堂鈔本」，則一直到民國十年（1921）才由陳乃乾收錄在《曲苑》中。

在「初稿本」中，王國維尚未擺脫明清戲曲目錄確立的著錄範圍：「余乃參考諸書並各種曲譜及藏書家目錄，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視黃氏之目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補者補之，粗為排比，成書二卷。」²⁵相較於「定稿本」，「初稿本」最大的缺失是宋金雜劇院本，這同樣也為明清諸家戲曲目錄所忽略。宋金雜劇院本不同於後世戲曲目錄中記載的亡佚劇目，前者多為藝人演出腳本，後者則出自文人之手。囿於編目者對著錄對象的限定——以是否有確鑿的作者信息與文本傳世作為判定標準，²⁶那些早已無文本流傳、作者更是不詳的宋金雜劇院本便不見於以往的戲曲目錄，只是在周密《武林舊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等書中留下一紙草目。受此影響，宋金雜劇院本也未進入「初稿本」收錄範圍。然而隨著編目工作開展，尤其是基於對戲曲史發展脈絡的思考，王國維認為理應將其納入。如談及《武林舊事》所載「官本

²⁴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9-370。

²⁵ 同前註，頁369。

²⁶ 明清戲曲目錄以載錄作家及劇目為主體，如鍾嗣成〈錄鬼簿·序〉：「敘其姓名，述其所作。」元·鍾嗣成：《錄鬼簿》，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2冊，頁101。錢泳〈曲目新編·小序〉：「（支豐宜）嘗取艾塘收錄之書，復參以近代所作者，彙為一卷，以便繙閱，俾知某曲出某本，某曲出某劇。」清·支豐宜：《曲目新編》，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9冊，頁129。呂天成〈曲品·自敘〉：「析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舊傳奇者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其未考姓氏者，且以傳奇附；其不入格者，擯不錄。」明·呂天成著，吳書蔭校注：《曲品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如上所引，宋金雜劇院本皆不在收錄範圍內。

雜劇段數」，王國維言：「北宋初葉，雜劇固已有腳本，唯無傳於後世者，且並亡其目耳。」²⁷ 對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所錄「院本名目」，王氏同樣認為：「此種院本大抵出於伶人之手者多，出於士大夫之手者少耳。」²⁸ 基於這一判斷，王國維在宣統元年（1909）〈曲錄·自序〉的開篇即亮明：「戲曲之興，由來遠矣。宣和之末，始見萌芽；乾淳以還，漸多纂述。泗水潛夫紀武林之雜劇，南村野叟錄金人之院本。」²⁹ 王國維對《曲錄》編目範圍的上溯反映了其探究戲曲起源的努力，其成果便是與《曲錄》同時收錄於《晨風閣叢書》的《戲曲考原》：「戲曲之不始於金元，而於有宋一代中變化者，則余所能信也。若宋末之戲曲，則具於《曲錄》卷一，茲不復贅。」³⁰

談及戲曲目錄的編纂方法，明清時期的編目者多首先確定參照本，然後在新發現材料的基礎上增補，後世學者也多能把握諸家戲曲目錄間的承傳之跡。如朱權《太和正音譜》「群英所編雜劇」便「大部分直接錄自鍾嗣成《錄鬼簿》……《錄鬼簿》所錄都是有主名的作家，而元代不少作品沒有留下作者姓名，《正音譜》增補了『無名氏』作品百餘種。……又《錄鬼簿》只錄元作家，而《正音譜》補充了『國朝』即明初作家八人。」³¹ 無名氏《傳奇彙考標目》「從其內容來看，像是就呂天成《曲品》、高奕《新傳奇品》加以補充擴展而成。」³² 《曲錄》採取了相同的編目策略：「余乃參考諸書並各種曲譜及藏書家目錄。」³³ 在「初稿本」的「雜劇類」，王國維以《太和正音譜》、《盛明雜劇》、《古名家雜劇》、《續古名家雜劇》、《嘯餘譜》、《北詞廣正譜》為參照本，並從《也是園書目》、《曲考》、《曲海目》中增補材料；「傳奇

²⁷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1，頁14下。

²⁸ 同前註，卷1，頁48上。

²⁹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9。

³⁰ 王國維：《戲曲考原》（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27上。

³¹ 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72。

³² 中國戲曲研究院：〈傳奇彙考標目·提要〉，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7冊，頁191。

³³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9。

類」則是以《曲海目》、《傳奇彙考》、《傳奇彙考標目》為參照本，並從《曲考》、《六十種曲》、《嘯餘譜》、《九宮大成》、《南詞定律》、《也是園書目》中輯補文獻。

光緒三十四年（1908）底，王國維首先是從陳毅（1873-？）處抄得明鈔本《錄鬼簿》，第二年初他又從劉世珩處借得呂天成《曲品》、高奕《新傳奇品》，這些書對「定稿本」的編纂修訂都產生了極為重要影響。

在元雜劇部分，「定稿本」將「初稿本」參照的《太和正音譜》替換為《錄鬼簿》。關於《錄鬼簿》，王國維首先是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從陳毅處傳抄了一部明鈔本《錄鬼簿》（簡稱「王鈔本」）：「黃陂陳士可參事，新得明鈔《錄鬼簿》，精妙可喜，因手鈔一過，七日而畢。原本間有訛字，悉為訂正。此為第一善本矣。」³⁴ 此本今歸日本東洋文庫。第二年春，王國維再得棟亭藏書十二種本《錄鬼簿》，此本今藏遼寧省圖書館。考慮到宣統元年（1909）三月「定稿本」即趨於完結，故王國維修訂《曲錄》時所參考的當為「王鈔本」。又，今人王鋼將《錄鬼簿》分為簡本、繁本、增補本三種版本系統，考察王國維此時所得兩種《錄鬼簿》，以及之後又從繆荃孫處影抄的尤貞起鈔本，三種皆屬繁本。³⁵

「王鈔本」上有三十餘則據《太和正音譜》的校讀筆記，對讀後的文字成為「定稿本」改動的重要依據。如「初稿本」「高文秀」條下有《敷衍劉耍和》，「王鈔本」則記《黑旋風敷衍劉耍和》。³⁶ 之後王國維不但在《錄鬼簿》眉批中記「『耍』作『耍』」，而且在「定稿本」中將劇名改為《黑旋風敷衍劉耍和》，且注：「『耍和』，《太和正音譜》作『耍和』，《錄鬼簿》於『紅字李二』『花李郎』二人下皆注云『教坊劉耍和』。」³⁷ 再如「初稿本」「汪澤

³⁴ 元·鍾嗣成：《錄鬼簿》，東洋文庫藏，黃仕忠主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2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王國維鈔本），第29冊，頁85。

³⁵ 王鋼：《校訂錄鬼簿三種》（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5-20。

³⁶ 元·鍾嗣成：《錄鬼簿》，王國維鈔本，頁13。

³⁷ 王國維：《曲錄》，稿本，宣統元年五月。

民」條記：「《糊塗包待製》一本，元汪澤民撰。澤民字叔志，婺源人，官集賢直學士，後死宣州之難，謚文節，《元史》有傳。」³⁸「王鈔本」的「江澤民」條有批語：「《太和正音譜》作汪澤民，汪字叔志，婺源人，《元史》有傳。此云真定人，自以江澤民為正。」³⁹至「定稿本」，王國維將「汪澤民」改為「江澤民」，並作補充：「文節死事遠在嗣成作《錄鬼簿》之後，今《錄鬼簿》中澤民在已死才人之列，則自以從姓江為是。」⁴⁰《太和正音譜》、《錄鬼簿》著錄的劇目名稱、作家信息偶有相異，「定稿本」悉數依《錄鬼簿》校改。

在「傳奇類」明末清初部分，「定稿本」又用《曲品》、《新傳奇品》替換掉「初稿本」的《曲海目》、《曲考》。宣統元年（1909）正月，王國維從劉世珩處抄得呂天成《曲品》、高奕《新傳奇品》，此書今亦歸東洋文庫：「此本從劉氏暖紅室假錄。原書篇第倒置、訛謬滋多，並為訂正。明人一代傳奇，略具此書。江都黃文暘《曲海》、無名氏《傳奇彙考》，均取材於此，此可寶也。」⁴¹在「初稿本」上的一處校改痕跡頗能說明王氏對《曲品》的看重：

《荊釵記》一本，明寧王朱權撰，黃文暘《曲海》題柯丹邱撰，蓋舊本題丹邱先生撰。此寧獻王道號，文暘誤以為柯敬仲耳。⁴²

王國維在「初稿本」上勾劃掉「黃文暘《曲海》」，改為「高奕《曲品》」；至「定稿本」，靜安又改成「明鬱藍生《曲品》」。王國維一直將學術研究的起點定位在可靠之文獻上，他用新得之《錄鬼簿》、《曲品》、《新傳奇品》代替《太和正音譜》、《曲海目》、《曲考》，便說明了其嚴謹的版本目錄學

³⁸ 王國維：《曲錄》，稿本，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³⁹ 元·鍾嗣成：《錄鬼簿》，王國維鈔本，頁23。

⁴⁰ 王國維：《曲錄》，稿本，宣統元年五月。

⁴¹ 王國維：〈曲品·跋〉，《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530。

⁴² 王國維：《曲錄》，稿本，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荊釵記》應為柯丹邱作，張大復《寒山堂曲譜》《王十朋荊釵記》下注「吳門學究敬先書會柯丹邱著」。王國維所記有誤，從黃文暘之語。

意識。

王國維還盡力避免使用二手文獻，如「初稿本」上有一段《琵琶記》的增補文字：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又云，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成，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蔣氏或有所據。⁴³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是王國維在研治戲曲的幾年間一直尋找的典籍，然而在編纂《曲錄》時一直未能得見原書，「初稿本」上的這段文字是從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轉引而來。《曲錄》完稿後，王氏依然沒有放棄對該書的尋跡。終於在 1912 年 11 月 8 日，王國維輾轉得知東京帝國大學藏有此書，他遂向鈴木虎雄（1878-1963）去信：「前聞大學藏書中有明人《堯山堂外紀》一書，近因起草宋元人戲曲史，頗思參考其中金元人傳一部分，能為設法代借一閱否？」⁴⁴鈴木虎雄很快便將《堯山堂外紀》交與王國維。王國維關於《琵琶記》的考察，也成為此後《宋元戲曲考》第十四章「南戲之淵源及時代」中為數不多的考證之一，足見王氏治曲之用心。

作家及劇目的著錄順序是《曲錄》編纂難點。《曲錄》大體按照作者生活年代的先後次序編排，王國維希望《曲錄》成為一部獨特的「自然呈現」曲史。「初稿本」、「定稿本」均最先載錄宮廷、宗藩，然後接續已知姓名者，方外、閨秀、僅知別號與無名氏依次殿後。難啃的骨頭集中在確知作者信息的劇目上，這同樣也是《曲錄》主體，「初稿本」為此採取了兩種方法。其一是照搬參照本順序，如自關漢卿至明初楊文奎，「初稿本」完全承襲《太和正音譜》；自清人吳偉業至黃兆森，總計二十七位傳奇作家又完全與《曲海目》相

⁴³ 王國維：《曲錄》，稿本，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⁴⁴ 〈王國維致鈴木虎雄〉，房鑫亮主編：《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0 月），頁 57。鈴木虎雄，早年求學東京大學漢學科，畢業後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京都帝國大學，著有《支那文學研究》、《支那詩論史》等。

同。其二是調整參照本原有順序，如在「明代傳奇」部分，盧柟、王世貞、梁辰魚、梅鼎祚與陳與郊被整體前移至湯顯祖前，許潮、陳汝元前移至車任遠前。上述調整均改變了《曲海目》的既有順序，這一改動是基於對《盛明雜劇》、《六十種曲》刊印時間的思考。沈泰《盛明雜劇》出版於明末，然而王國維一直到「晨風閣本」出版後的宣統元年（1909）冬才在書肆得見《初集》：「己酉冬日，得此書於廠肆。」⁴⁵至於《二集》，則至民國十四年（1925）董康誦芬室影印時才獲見。《曲錄》對《盛明雜劇》所收劇目的徵引當是源自顧修《彙刻書目初編》。毛晉《六十種曲》在明末曾分六次編刻，每次一套，每套十種，至清初重刻時一次性出齊六套，因而得名「六十種曲」。王國維所藏一百二十冊《六十種曲》，為清初刊本。⁴⁶在「初稿本」中，凡是《盛明雜劇》、《六十種曲》著錄有同一作家，王國維在編排傳奇時均將其前置於《六十種曲》所收其他作家之前，王國維當是認為《盛明雜劇》所錄作家的生活年代略早於《六十種曲》載錄的作家。⁴⁷王國維在沒有目驗原書、也未詳細考證作家的前提下，貿然根據總集的刊印時間來判定作家先後次序，這未免有失偏頗。

「定稿本」大體依據「初稿本」的著錄順序，只是作出細節調整，具體情況可以分為「跨文體」、「跨朝代」與「同卷內」三種類型。「跨文體」即改變「初稿本」對劇目的雜劇、傳奇文體歸類的判斷，如吳偉業《通天臺》、《臨春閣》、《秣陵春》在「初稿本」歸入傳奇類，「定稿本」將其劃入雜劇類；洪昇《四嬋娟》從「初稿本」傳奇類，歸入「定稿本」雜劇類。王國維在編纂《曲錄》時持有《太和正音譜》、《曲海》、《曲考》、《傳奇彙考》、《錄鬼簿》、《曲品》、《新傳奇品》等戲曲目錄，除此之外，王氏還自藏有傳奇、雜劇兩

⁴⁵ 王國維：〈《盛明雜劇》初集·跋〉，《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3。

⁴⁶ 《靜庵藏書目》記：「《六十種曲》，一百廿冊。」王國維：《靜庵藏書目》，《王國維全集》，第20冊，頁146。

⁴⁷ 《盛明雜劇》、《六十種曲》均收錄梁辰魚、葉憲祖、梅鼎祚、陳汝元、徐復祚、袁于令、汪廷訥的雜劇與傳奇。在依《六十種曲》著錄明代傳奇作家時，王國維均將他們前置於《六十種曲》所收其他作家之前。

百餘種。⁴⁸ 然而《曲錄》著錄劇目多達三千餘種，王國維家藏劇目數量又十分有限。所以儘管《曲錄》經過了「初稿本」、「定稿本」的反復調整，但是王國維在判斷劇日文體時仍有紕漏，如《秣陵春》就被錯歸入了雜劇，《西廂記諸宮調》也被誤入傳奇。「跨朝代」即是調整作家的生活朝代，如「初稿本」雜劇類將黃方印、來集之歸入清人，「定稿本」則將其劃入明人。更多的是同一文體、同一朝代的「同卷內」調整。如雜劇類的黃元吉、陳鐸、馮惟敏、桑紹良、王衡被提前，傳奇類萬樹與嵇永仁、黃家舒與龍燮的順序對調，群玉山樵、林於閣主人、空觀主人、西泠野史提前至土室遺民、碧蕉軒主人前。對於此番調整，是基於王國維注重利用旁涉文獻進行推擬。如現今《也是園書目》有兩種版本，其一如翁心存藏鈔本、劉氏味經書屋藏鈔本等，標黃元吉是「明人」；其二如劉履芬藏鈔本、鮑廷博藏鈔本，將黃元吉記為「元明人」。⁴⁹ 在「初稿本」中，王國維從《也是園書目》依次逐錄了陳鐸、黃元吉與桑紹良。至「定稿本」以及「晨風閣本」，王國維則將黃元吉提前至王九思前，並言：「《黃

⁴⁸ 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本附《靜庵藏書目》，據彭玉平考證編訂於宣統元年（1910）閏二月至夏五月間，這正是《曲錄》接近完稿時。除戲曲目錄外，《靜庵藏書目》還記載《西廂記》、《長生殿》、《牡丹亭》（兩種版本）、《帝女花》、《桃溪雪》、《董西廂》、《琵琶記》、《曇花記》、《曲西堂曲腋》（內含六種）等傳奇十五種，另有《元曲選》收雜劇一百種、《六十種曲》收傳奇六十種。黃仕忠又披露日本各公私圖書館還有王國維舊藏戲曲《周憲王樂府三種》、《繡像傳奇十種》、《折桂記》、《竊符記》、《紫釵記》、《南柯夢》、《拜月亭記》「明劇七種」等二十五種。從上述統計來看，王國維編纂《曲錄》時持有的雜劇、傳奇劇本有二百餘部，這與他在「晨風閣本」序言中所言「共得三千餘種，篋中所藏尚不逮十分之一」的數據已比較接近。參彭玉平：〈《靜庵藏書目》與王國維早期學術〉，《復旦學報》2010年第4期（2010年7月），頁24-37；黃仕忠：〈王國維舊藏善本詞曲書籍的歸屬〉，《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黃仕忠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頁389-398；王國維：〈曲錄·自序〉，見《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9。

⁴⁹ 以上諸《也是園書目》鈔本，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翁心存藏鈔本索書號02801，劉氏味經書屋藏鈔本索書號02802，劉履芬藏鈔本索書號14676，鮑廷博藏鈔本索書號08123。

廷道夜走流行馬》一本，見《也是園書目》。明黃元吉撰，《也是園書目》作『元明黃元吉』，蓋亦明初人也。」⁵⁰ 此處王國維是襲用了後者觀點。在判斷王實甫由金入元身份時，王國維寫道：「實甫所作《麗春堂》雜劇，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煙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禱金皇作結。則此劇之作，尚在金世，實甫亦由金入元者矣。」⁵¹ 這又是從劇本中尋找到的內證。再如邵璨《香囊記》，「初稿本」將其放置在庾庚、龍渠翁、阮大鍼前，處在明末。而「定稿本」則將其提前至邱濬之後，幾近於明初。王國維在「定稿本」援引明中後期文人王世貞《藝苑卮言》有關《香囊記》「雅而不動人」評價，⁵² 故認為《香囊記》不會至明末才問世。不置可否，《曲錄》所涉曲家範圍殊廣，王國維無法做到逐一考證，只能是「粗為排比」。⁵³ 鄭振鐸也認為王國維「當時見到的書太少，故每有捕風捉影的推測之談」。⁵⁴ 這些失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王國維戲曲研究活動的開展，以及《曲錄》學術價值的提升，更是直接誘發學術界匡正、續補《曲錄》的工作，下文將詳述。

針對作家名下的具體細目，《曲錄》著錄項由「初稿本」兩項增補為「定稿本」四項。「初稿本」第一項是劇目，王國維按照先版本明確、後僅知劇名的順序著錄。第二項是作家小傳，它包括作家姓名字號、闕里仕宦等，略作史實考察。這一時期的王國維初涉戲曲，他對曲家的了解遠不及於對詞人的熟稔，故在編纂「初稿本」時，作者小傳多是沿襲了既往戲曲目錄記載。「定稿本」較「初稿本」有了顯著變化，其著錄項依次包括劇目、所據戲曲目錄、作家小傳，並從相關論著中輯錄文獻，體例愈顯沉潛從容、精純適當：「考訂作

⁵⁰ 王國維：《曲錄》卷三（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5上。

⁵¹ 王國維：《曲錄》卷二（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2下。

⁵² 王國維：《曲錄》卷四（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5上。

⁵³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8。

⁵⁴ 鄭振鐸：〈元明以來雜劇總錄·序〉，《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926。

者、注明版本、標明出處，閱者歎為藝林未有之盛業。」⁵⁵

首先王國維打破了「初稿本」先著錄有明確版本、後記劇目的原則，而是整體移錄參照本的劇目及順序，且註明參考的戲曲目錄。之後再接續從其他目錄中增補的劇目，並標明依據文獻。得益於此，王國維不僅在劇目名稱下註明版本，還簡明扼要地呈現劇目在既往戲曲目錄中的著錄，我們不妨將這一方法命名為「以目證目」。此番處理準確呈現了劇目在以往諸家戲曲目錄的記載線索，有利於研究者瞭解新見劇本的發現、載錄過程，並且從中找出舊存文本的損毀、散佚線索，還能夠發現同劇異名、同名異劇以及同一作者的劇作被分散在不同作者、文體下的錯訛。

與之同時，王國維還採取了「輯錄式」的提要撰寫方式，即從歷代典籍中摘錄作家史實文獻與劇目評點內容。《曲錄》之前的戲曲目錄如《錄鬼簿》、《曲品》、《今樂考證》等，雖有目錄之實而無目錄之名；或如《曲海目》《古人傳奇總目》等，雖有目錄之名然內容卻過於簡陋。其原因在於它們多沒有跳出蹈襲前人的路徑，無非是在數量上有所增隕、文體上以示區別罷了。王國維除了從歷代戲曲目錄中獲得基本文獻，更注意從經典目錄學著作中汲取體例的涵養，尤其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朱彝尊《經義考》、永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曲錄》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王國維親自校錄有《直齋書錄解題》，⁵⁶《詞錄》、《曲錄》等更多援引該書。對於此書，潘景鄭評價：「《崇文總目》及《遂初堂書目》皆僅著錄書名，不及攷訂之事，未厭讀者之願。晁、陳二書（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能窮溯圖書源流，有繼往開來之功，為研治目錄學之規範。」⁵⁷相較於《直齋書錄解

⁵⁵ 任讷：〈《曲錄》初補〉，《國聞週報》第3卷第43期（1926年11月），頁2-4。

⁵⁶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刻本，六冊，宋陳振孫撰，有眉注十餘則。」見趙萬里：〈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年4月），頁163。

⁵⁷ 潘景鄭：〈直齋書錄解題·前言〉，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

題》，朱彝尊《經義考》對王國維詞曲目錄編纂的影響更為直接。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詞錄》完稿，對於此書體例，王國維言：「偶得仁和吳昌綬伯宛所作《宋金元現存詞目》，歎其蒐羅之勤，因思仿朱竹垞《經義考》之例，存佚並錄，勒為一書。」⁵⁸《曲錄》上承《詞錄》而來，勢必受到《經義考》、《詞錄》體例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是長期以來被王國維視為目錄學典範。⁵⁹王國維從相關材料中輯錄文獻，並將戲曲批評引入到戲曲專科目錄的編纂中，這使《曲錄》兼具彙錄、考訂與學術批評的特質。據筆者統計，「定稿本」援引的歷代筆記有《癸辛雜識》、《樂郊私語》、《藝苑卮言》、《少室山房筆叢》、《禮耕堂叢說》、《青溪暇筆》、《嘯亭雜錄》，詩文集有《天籟集》、《鐵崖文集》、《尤侗集》、《靜志居詩話》、《帶經堂詩話》、《全祖望集》、《漁洋詩話》、《曝書亭集》、《頤道堂集》，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

徵引文獻從文學品鑒的層面論及戲曲的文體特徵、作品藝術風格，因而具有較高的文學批評價值。王國維又在作家小傳中加入了對仕宦事蹟、同名劇目、輯佚方法與範圍等內容的考證，述而又考；這部分擁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體現了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⁶⁰至此，劇目評點與史實考證完成了《曲錄》的理論呈現與史料載錄的統一。

⁵⁸ 王國維：《詞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序例〉，頁1。

⁵⁹ 趙萬里曾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撰寫有「王國維《傳書堂藏書志》」提要：「（《傳書堂藏書志》）分類悉遵《四庫全書總目》，每書首載序跋、姓氏、年月及首卷前題下之銜名，次作一簡短之提要，至收藏印記、名賢題識，無不備書。」《曲錄》著錄項雖不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傳書堂藏書志》繁複，但在整體形態上，多有相近。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25冊，頁53。

⁶⁰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四部備要影印原刻本），〈自序〉，頁1。

四、《曲錄》與王國維詞學研究的學術際緣

早年的王國維濡染於西方哲學，三十歲後才折向文學，並萌生了「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的宏大誓願。⁶¹《詞錄》、《人間詞話》、《曲錄》是王國維邁入「文學時代」的第一批學術成果。《詞錄》完稿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初稿本」上承《詞錄》而來：「余作《詞錄》竟，因思古人所作戲曲，何慮萬本，而傳世者寥寥。」⁶²《人間詞話》則成書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至九月間，它幾與「初稿本」的編纂同步。至擬定「定稿本」的宣統元年（1909）元年至五月之間，王國維還先後校錄有六種詞集。⁶³那麼探究王國維《曲錄》與《詞錄》、《人間詞話》等一系列詞學研究、著述間的冥合關係，便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情了。

最明顯的即是《曲錄》對《詞錄》體例的因襲。《詞錄》「仿朱竹垞《經義考》之例，存佚並錄，勒為一書」，⁶⁴《曲錄》在載錄具體細目時亦「遇而廢之，不若遇而存之」，⁶⁵無論存佚，悉數收錄。「初稿本」與《詞錄》的著錄項也大體一致，包括作品的名稱及作家小傳，並且採用先別集、後總集的兩大模塊。

相較於體例，《曲錄》體現的藝術觀念才是該書對靜安詞學研究最重要的繼承，這要首先從《曲錄》作為一部目錄學著作的文體特徵與論說方式談起。

在王國維研治曲學的初期（1908-1910），其主要是進行文獻的搜述與整理，這一工作與編寫《人間詞話》的方法、理念迥然有異。他深知理論的闡發

⁶¹ 王國維：〈教育偶感四則〉，《王國維全集》，第1冊，頁138。

⁶²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8。

⁶³ 《人間校詞札記十三種》是王國維繼《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後，校輯宋元人詞集的札記，其中的《梅苑》（宣統元年閏二月）、《山谷詞》（宣統元年四月）、《樂章集》（宣統元年五月）、《後村別調》（宣統元年四月）、《近體樂府》（宣統元年五月）、《姑溪詞》（宣統元年五月）等，皆完成於此期。

⁶⁴ 王國維：〈詞錄·序例〉，頁2。

⁶⁵ 同前註。

必然會破壞目錄學著述的核心價值，「定稿本」因而不得不恪守文獻學的著錄規範。即便是如此，王國維還是通過徵引《太和正音譜》、《列朝詩集》、《藝苑卮言》、《新傳奇品》等，試圖把握古典戲曲的抒情特徵與藝術韻味。筆者統計「定稿本」所撰提要，引《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57人次，《新傳奇品》18人次，《列朝詩集》15人次，《藝苑卮言》11人次，《靜志居詩話》、《曲品》各6人次，引用其他典籍1至2人次不等，提要實已成為《曲錄》重要的「副文本」。⁶⁶從文獻學角度講，徵引文獻的「徵信」程度是以文獻的存佚、真偽、傳播和接受等客觀要素的依次再現來體現的；資料的真實度、廣博度，建構了其理論探索的切入角度與視野，同樣決定了作者文學感悟的方向性、準確性和研究成果的縱深度。⁶⁷以《太和正音譜》、《新傳奇品》為例，「古今群英樂府」收元明作家一百八十七人，《新傳奇品》著錄明末清初作家二十七位，然《曲錄》只分別移錄了近三分之一的作家及評點文字。故王國維當有一定的擇取標準，所引文獻必然蘊含其某些學術思考與目的。且在論說方式上，王國維通過徵引文獻表達文學觀念，這也非《曲錄》首創，靜安此前已深諳此法。如〈文學小言〉第八則以「『燕燕於飛，差池其羽。』『燕燕於飛，頡之頡之。』『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開篇，論說「感情真者，其觀物亦真」的意義。⁶⁸在《詞錄》中，王國維亦引經據典，如論皇甫松〈壇藥子〉詞時引黃叔暘：「松以〈天仙子〉著名，不若〈摘得新〉二首為有達觀之見。」⁶⁹雖然《曲錄》沒有主觀上的藝術分析，但我們應確認其所引文獻實已蘊含了王國維的文學主張。

⁶⁶ 所謂「副文本」，是指圍繞在核心文本周圍的依附性文字，它蘊含著正文本沒有的信息，為研究者理解文本提供輔助材料與闡釋路徑。《曲錄》作為一部戲曲目錄，其核心文本是作家、劇目，「初稿本」便著錄此部分內容。提要則可以視為其「副文本」，這是至「定稿本」時才被王國維添入的。

⁶⁷ 參閱定慶：〈探索王國維詞學體系的另一個維度——《詞錄》與王國維「為學三變」的文獻學取向〉，《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2007年3月），頁97-104。

⁶⁸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94。

⁶⁹ 王國維：《詞錄》，頁2。

「意境」是王國維於詞學研究的重要創獲，對於這一問題，既往學界主要是在王國維的詞學研究範疇內討論，未將其延伸到曲學研究。其實不然，作為《曲錄》的「副文本」，王國維所輯文獻包含了大量契合「意境」理論的材料。相較於其詞學的「意境」理論闡釋，《曲錄》更關注「意境」於情感、述事、詞句等方面的理論內涵與表現形態。

首先，「意境」在作品中內化潛泳需要激揚、動人的情感。王國維一向稟有憂鬱、悲觀、敏感的性格，他在自我敘述中講到：「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⁷⁰這使其對作品內涵的深醇感情極易產生觸動，尤其是體悟劇作中的憂傷哀婉。《曲錄》引《藝苑卮言》、《靜志居詩話》，評湯顯祖「《牡丹亭》曲本，尤真摯動人」，薛近兗「《繡襦記》足以感人如此」，史集之「倜儻不羈，笑傲一世」，薛旦「如鮫人泣淚，點滴成珠」，歸莊「《萬古愁》曲子，瑰環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⁷¹劇作如何做到感人？《曲錄》所引王世貞《藝苑卮言》回答道：「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⁷²即真實、生動地反映生活所見，不矯揉造作，方能實現情與境的自然交融。這正合《人間詞話》所講：「境非獨謂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⁷³王國維對湯顯祖《牡丹亭》、薛近兗《繡襦記》的評價，⁷⁴體現的便是重視真情實感的文學觀念；其對《藝苑卮言》的援引，則又道出了情與境的辨證關係。

⁷⁰ 王國維：〈三十自序〉，《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19。

⁷¹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卷四，頁10上、卷四，頁8上、卷五，頁13下、卷五，頁4下、卷五，頁16上。

⁷²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四，頁4上。

⁷³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94。

⁷⁴ 「薛進兗」：「《曲品》嘗聞《玉玦》出而曲中無宿客，及此記出而客復來，詞之足以感人如此。」「湯顯祖」：「《靜志居詩話》：義仍填詞，妙絕一時，語雖嶄新，源亦出於關、馬、鄭、白。其《牡丹亭》曲本，尤真摯動人。」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四，頁8上、頁10上。

與稱道上述諸劇相反，《曲錄》在談及《伍倫全備記》時再引《藝苑卮言》：「《伍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⁷⁵早在王國維之前就多有曲家批評《伍倫全備記》，如徐復祚《曲論》稱其「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⁷⁶祁彪佳《遠山堂曲品》批評該劇「盡述五倫，非酸即腐矣；乃能華實並茂，自是大老之筆」，⁷⁷皆貶斥《伍倫全備記》旨在宣揚道德綱常。王國維宣揚「純文學」的主張，反對文學的功利目的，如〈文學小言〉所講：「余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⁷⁸他尤為抵觸文學與政治結緣：「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如此者，其褻瀆哲學與文學之神聖之罪固不可逭。」⁷⁹理學家出身的邱濬在《伍倫全備記》中宣揚「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的是「勸化世人，使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覺為政教存續服務。⁸⁰該劇充斥著假道學，實已脫離文學自身的旨趣。在《曲錄》徵引文獻中，《藝苑卮言》是王國維引用率頗高的著作，足見此書與王國維的文學思想多有契合。且在靜安的美學思想體系中，王世貞關於「境」「古雅」的表述也被其承襲。⁸¹文獻采錄是在深刻理解原著美學志趣基礎上的提取凝練，王國維對文獻的擇取不僅能夠反映其個人的文學思想，所引文獻也能與原作者的文學理念相謀合。

⁷⁵ 同前註，卷四，頁5上。

⁷⁶ 明·徐復祚：《曲論》，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頁236。

⁷⁷ 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6冊，頁46。

⁷⁸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92。

⁷⁹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全集》，第1冊，頁123。

⁸⁰ 明·邱濬：《伍倫全備記》（明世德堂刊本），第一齣〈副末開場〉，頁2下。

⁸¹ 王世貞：「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境。」「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上述觀點被《人間詞話》多有襲用。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頁204、224、23。

其次，「意境」的呈現是基於作品敘事的「自然」表達。在王國維早期觀念中，中國的敘事文學並不發達：「敘事的文學，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⁸²相較於抒情文學，敘事文學所需之時日、材料，對作家天資的要求也更高：「敘事，則其所需之時日長，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⁸³何為理想之敘事？《人間詞話》給出回答：「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⁸⁴結合古典戲曲，王國維所言「構造」接近於關目、排場的表述。關目即故事情節結構，它要求富有內涵、戲劇性的情節，情節的展開依照內在邏輯逐步推進。《曲錄》引《新傳奇品》來稱道李玉「康衢走馬，操縱自如」，朱佐朝「八音縱鳴，時見節奏」，朱雲縱「如駿馬嘶風，弛驟有矩」，便是基於這一認識。⁸⁵在這一問題上，《曲錄》多是標舉明清傳奇而未言及元曲，這與《人間詞話》的主張相近：「（元曲）思想之陋劣，佈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噴飯。至本朝之《桃花扇》、《長生殿》諸傳奇，則進矣。」⁸⁶王國維認為戲曲當「以佈局為主」，⁸⁷元曲卻「關目之拙劣」，⁸⁸很少能夠找到使得故事發生變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並由之導向矛盾衝突的高潮。對於元曲的這一缺點，清初李漁也有「白與關目，皆其所短」的相近看法。⁸⁹相較而言，明清傳奇的排場結構要精心許多。明清曲家用文人的審美觀念重構傳奇敘事結構，使之複雜、嚴密，頭緒紛繁卻一絲不亂，照應妥帖，這在李玉、朱佐朝等蘇州劇派作家中有精彩表現。《桃花扇》更是以興亡之歎為經，以兒女情

⁸²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96。

⁸³ 同前註。

⁸⁴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198。

⁸⁵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五、頁6上，卷五、頁8上，卷五、頁14下。

⁸⁶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172。

⁸⁷ 同前註。

⁸⁸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105。

⁸⁹ 清·李漁：《閒情偶寄》，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7冊，頁17。

長為緯，再分左右、奇偶四部，人物、情節有序穿插，推動故事情節自然地向前推演。

作為「意境」的核心要旨，誠然《曲錄》多有稱道明清傳奇在關目、排場等敘事方面的表現。但是至《宋元戲曲考》，王國維卻有「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⁹⁰此後的靜安更是產生了「明以後無足取，元曲為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的偏見，⁹¹大有全盤否定明清戲曲之傾向。筆者以為，王國維早期的戲劇觀念受西方戲劇影響甚深，他將戲曲定為敘事文學：「就抒情的文學言之，〈離騷〉、詩詞皆是；至敘事的文學，謂敘事傳、史詩、戲曲等。」⁹²「詞之於戲曲，一抒情，一敘事，其性質既異。」⁹³關目、排場由此成為鑑賞元曲與明清戲曲的重要考量，在這一方面，元曲表現實屬不佳。然而隨著《曲錄》編纂工作的開展，特別是對元曲抒情性特徵把握的深入，以及此後數年研究的跟進，王國維愈發正視並強調抒情要素作為古典戲曲基本特徵的存在意義，元曲在此方面的表現顯然更優。這就不僅勾連起詩、詞、曲作為抒情文學的內在理脈，如《宋元戲曲考》所講：「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按，即「意境」），元曲亦然。」⁹⁴這也使靜安不再苛責元曲於思想、結構方面的粗笨、拙劣，並極力推舉「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元曲）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且評價「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于前人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⁹⁵從這一點上看，王國維有關「意境」理論的思考經歷了動態變化過程。而且從

⁹⁰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106。

⁹¹ （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

⁹²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96。

⁹³ 王國維：〈三十自序〉，同前註，頁122。

⁹⁴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106。

⁹⁵ 同前註，頁105、106。

詞學再到曲學，「意境」的表現形態、理論內涵、內部要素，也隨著文體轉換、材料的掌握、認識的深入，在不斷地豐富、演化以及調適。

最後，「意境」還要通過自然、淳樸的語言呈現，這是在此前真摯情感、敘事自然基礎上的提升：「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⁹⁶《曲錄》談及《琵琶記》的語言時引《藝苑卮言》「不唯其琢句之工」，⁹⁷即指《琵琶記》人物表達的「如其口出」。⁹⁸《人間詞話》對語言的「自然」亦有相近表述：「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⁹⁹王國維稱讚淳樸、自然的語句，反對堆砌辭藻，「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¹⁰⁰基於這一標準，《曲錄》引《太和正音譜》稱讚宮大用「詞鋒犀利，神彩燁然」，引《新傳奇品》稱道陳二白「如閨女親妝，不增嬌飾」。¹⁰¹至《宋元戲曲考》，「述事則如其口出」作為「意境」理論的核心要素被再次提及。¹⁰²

在《曲錄》中，王國維的援引文獻實為業已成系統的「意境」理論補充了大量材料。簡而言之，在《曲錄》的話語體系下，「意境」是指曲家在擁有樸素率性、超脫塵俗心理的基礎上，用淳樸、真切的語言，自然暢達地表現敘事內容，彰顯動人、真摯的情感，從而體現文本廣博的解讀內涵和醇雅的藝術韻味。動人、自然、真切是《曲錄》構建的意境說「三要素」。¹⁰³誠然王國維

⁹⁶ 同前註，頁 105。

⁹⁷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四、頁 4 上。

⁹⁸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106。

⁹⁹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 110。

¹⁰⁰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107。

¹⁰¹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二、頁 25 下，卷五、頁 14 下。

¹⁰²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 106。

¹⁰³ 針對王國維「境界」理論的原旨，彭玉平有總結：「所謂境界，是指詞人在擁有真率樸素、超越利害之心的基礎上，通過寄興的方式，用自然明析的語言，表達出外物的真切神韻和作者的深沉感慨，從而體現出廣闊的感發空間和深長的藝術韻味。格調是其精神底蘊，名句是其表現形式。自然、真切、深沉、韻味則堪稱是境界說的『四要素』。」參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312。

沒有在《曲錄》中明確提出「意境」二字，但作為「意境」理論的內核，豐腴的情感、自然的述事、富有韻味的詞句，與《太和正音譜》、《藝苑卮言》、《新傳奇品》等著作的部分敘述深度契合。至編纂「定稿本」，王國維採取主題先行的批評方法，以「意境」為美學標準，從備選文獻中尋找適合材料，引而不論。原先彼此獨立的文獻被打散、重組，更是在《曲錄》「副文本」這一新的文學場域內建立起緊密聯繫，共同指向「意境」的理論內核。「意境」使《曲錄》文本的內在張力得以舒展，賦予《曲錄》文獻解讀以豐富的內涵，成為其學術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

《曲錄》以「意境」理論為核心論證古典戲曲的審美特徵，這也迎合了王國維提振戲曲於中國文學地位的努力。「純文學」在王國維的文學觀念中懸格甚高，不過這一概念早先主要是針對抒情文學。〈三十自序〉雖認為小說、戲曲是「真正之文學」，¹⁰⁴但它們並不完全符合王國維「純文學」的標準：「《三國演義》無純文學之資格……《水滸傳》之寫魯智深，《桃花扇》之寫柳敬亭、蘇昆生，彼其所為固毫無意義。然以其不顧一己之利害，故猶使吾人生無限之興味，發無限之尊敬。」¹⁰⁵在「初稿本」中，王國維仍缺少對古典戲曲詩性、抒情性特徵的思考，因而也沒有扭轉古典戲曲「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的看法。¹⁰⁶至「定稿本」，王國維以「意境」為論說核心，這不僅勾連起詞曲的學術際緣，更重要的是以戲曲嫁接起敘事文學與抒情文學的溝通橋樑，擺脫了既往二元對立的偏執看法。王國維對古典戲曲抒情特徵的理解，更使其考察戲曲於中國文學中地位的努力變成了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激蕩物態，抉發人心，舒軫哀樂之餘，摹寫聲容之末，婉轉附物，惆悵切情。」¹⁰⁷故《曲錄》對「境界」理論的呈現與闡發，明確了戲曲作為「純文學」的本質特徵，也提升了戲曲於中國文學的地位。

¹⁰⁴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92。

¹⁰⁵ 同前註，頁97。

¹⁰⁶ 王國維：〈三十自序〉，《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22。

¹⁰⁷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9。

從文體遞嬗的角度考察詞曲演進也是王國維詞曲研究的核心之一，《詞錄》、《人間詞話》、《曲錄》每每論及詞曲發展的內在流變，都蘊含著王國維有關「文體演進論」的深邃思考。在編撰《詞錄》、《人間詞話》時，王國維即有意探尋詞曲間的文體差異。《詞錄》所載元亨《小隱餘音》、鄭杓次《夾漈餘聲樂府》、馮華《樂府》，是王國維從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盧文弨《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詞曲類」輯錄而得，王國維認為它們「是詞是曲疑不能明也」。¹⁰⁸ 待編寫《人間詞話》，王國維對詞曲差異有了更深認識，他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王明清《揮塵錄》載曾布所作〈馮燕歌〉，已成套數，與詞律殊途。」¹⁰⁹ 明確詞曲之別既是「文體演進論」的必然需求，也有利於其在幾乎是同時編纂的《人間詞話》、《曲錄》中，關照戲曲的起源、詞曲的文體升降。在此基礎上，王國維便著意從詞、曲的相循轉換角度切入對戲曲起源的探討。《人間詞話》記：「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遊者，亦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¹¹⁰ 此語從詩、詞聯繫切入，論詩至北宋已如強弩之末，詞則一躍成為新寵，然而至探討詞曲關係時卻收起筆鋒。不過為之響應，王國維在《曲錄》中引《藝苑卮言》：「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¹¹¹ 詞曲間的內在關聯了然明確。

與此同時，不僅是《詞錄》、《人間詞話》隨處可見戲曲史料，而且又有詞學文獻散見於《曲錄》中，它們同樣多關涉詞曲文體的轉換。在《詞錄》中，

¹⁰⁸ 王國維：《詞錄》，頁46。

¹⁰⁹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317。

¹¹⁰ 同前註，頁139。

¹¹¹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四，頁7上。

王國維於《聊復集》中提及趙令時〈蝶戀花〉：「《西河詞話》謂此詞為戲曲之祖，則尤可貴也。」¹¹²指明詞曲間的承繼關係。王國維也試圖對戲曲的起源進行擬測，如認為《樂府雅詞》卷首所載〈調笑轉踏〉「首有致語，末有放隊，每調之前有口號詩，甚似曲本體例」，發展到董穎的道宮〈薄媚〉「凡十隻曲，皆平仄通押，則竟是套曲，此可與《弦索西廂》同為曲家之筆路」。¹¹³再至《曲錄》，王國維判定《南村輟耕錄》所錄院本名目當是金人之作：「《董西廂》多用宋人詞調，此目中之以調名者亦詞、曲相半。」¹¹⁴王國維在從事詞曲研究時，分別下探、上溯曲與詞的淵源關係，可見其文學通史觀視域下的詞曲研究。

我們還能夠在《人間詞話》中找到《戲曲考原》相關觀點的雛形。《戲曲考原》成書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底至次年初，曾載於《國粹學報》第四十八（1908）、五十期（1909），後與「定稿本」一同收錄在《晨風閣叢書》內。從《人間詞話（稿本）》上的刪改情況判斷，《戲曲考原》部分內容可視作《人間詞話》的「副產品」。《人間詞話》在王氏生前經其手訂刊布者有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宣統元年（1909）之交的《國粹學報》本，1926年北京樸社出版了經俞平伯點校的《國粹學報》本。《人間詞話（手稿）》本上有○、△、<三種圈識符號，佛雛結合手稿上的形態判斷，認為：「《詞話》條目頂端加圈者，表示定稿時選用。此種加圈之條目共有 60 則，均在刊於《國粹學報》上的 64 則（其中手稿 63 則）之內。」¹¹⁵那些未被圈識出的條目，並非被王國維遺棄，部分內容被移錄到了《戲曲考原》中。如在《人間詞話（稿本）》，王國維思考戲曲起源：「《提要》：『王明清《揮塵錄》載曾布所作〈馮燕歌〉，已成套數，與詞律殊途。』毛西河《詞話》謂趙德麟令時作商調鼓子

¹¹² 王國維：《詞錄》，頁 14。

¹¹³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 317。

¹¹⁴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一，頁 48 上。

¹¹⁵ 佛雛：〈《人間詞話》手稿補校後記〉，《揚州師院學報》1987 年第 3 期（1987 年 10 月），頁 25-35。

詞譜《西廂》傳奇，為雜劇之祖。」¹¹⁶此語意在追蹤雜劇形成的源頭。至《戲曲考原》，王國維繼續稱引此條：「德麟此詞，毛西河《詞話》已視為戲曲之祖。然猶用通行詞調，而宋人所歌除詞調外，尚有所謂大曲者。」¹¹⁷再如《人間詞話》引程明善《嘯餘譜》，總結北宋燕樂盡制儀程：「宋人遇令節、朝賀、宴會、落成等事，有『致語』一種。宋子京、歐陽永叔、蘇子瞻、陳後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嘯餘譜》列之於詞曲之間。」¹¹⁸王國維於《人間詞話（稿本）》此條上的批改、塗抹極多，幾不可辨，然而該條最終也沒有刊登於《國粹學報》。但是在《戲曲考原》，王國維卻稱引蘇軾〈集英殿秋宴教坊詞致語口號〉，意在說明北宋雜劇的演出儀式：「教坊致語、口號、勾合曲、勾小兒隊、隊名、問小兒隊、小兒致語、勾雜劇、放小兒隊、勾女童隊、隊名、問女童隊、女童致語、勾雜劇、放女童隊。」¹¹⁹王國維甚至還用《戲曲考原》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轉引《嘯餘譜》「樂語」卷內容。出於體例及思考的局限，《人間詞話》有關戲曲起源的考察較為粗淺，很多問題未及展開就草草結束。《戲曲考原》成於《人間詞話》後，並與「定稿本」撰於同時，此時王國維對戲曲文獻的佔有已較豐富，很多問題也就得以展開並深入。

無論是《詞錄》確立的專科目錄體制基本方向，還是《人間詞話》對古典戲曲意蘊的闡釋與生發，二者都深刻影響了《曲錄》的編纂。「意境」是王國維詞學研究的核心批評概念，他通過援引典籍將「意境」理論再次引入《曲錄》，「意境」由此成為貫穿於王國維詞曲研究的內在線索之一。¹²⁰與此同時，

¹¹⁶ 王國維撰，徐德明整理：《王國維「人間詞」「人間詞話」手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1。

¹¹⁷ 王國維：《戲曲考原》（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17下。

¹¹⁸ 王國維：《王國維「人間詞」「人間詞話」手稿》，頁82。

¹¹⁹ 王國維：《戲曲考原》（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4上-頁7上。

¹²⁰ 至《宋元戲曲考》，王國維再次將情、景、敘事與意境一同拈出：「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從《人間詞話》、《曲錄》再到《宋元戲曲考》，體現了作為內在線索的「意境」理論，其於王國維文學思想中的穩固地位。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106。

《詞錄》、《人間詞話》涉及的戲曲文獻、典籍還誘使王國維思考詞曲間的文體差異與轉換，這與《曲錄》對詞曲淵源的考察形成互為犄角之勢，更為《戲曲考原》提供了部分文獻依據。《曲錄》對作家、劇目的按序臚列，以及《曲錄》從文體遞嬗的角度梳理詞曲演進，二者使其具備了「曲史」性質。徵引文獻作為「副文本」，又凸顯了以「意境」為核心的戲曲審美功能。至此，曲史線索的鉤稽與藝術觀念的闡釋一併隱匿在了《曲錄》的編纂與論證系統中。

五、《曲錄》的批評、評點與補證¹²¹

《宋元戲曲考》以「觀其會通、窺其奧窔」的學術方法與視野影響著近代以來的戲曲研究，《曲錄》則是「就各家書目所載及有傳本者，錄其名目，並作者爵里為一編，以便稽考」，¹²² 學界均受益極多。誠所謂「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¹²³ 自《曲錄》問世起，它便成為戲曲學人研治曲學的案頭工具書。然而在編纂《曲錄》時，王國維剛剛涉獵曲學不久，不僅寓目、搜輯的文獻數量有限，一些學術觀點還有失實之處。與此同時，清末民初又是古典戲曲研究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可供王國維參考的戲曲目錄、學術成果亦少。如就在「定稿本」剛剛交付沈宗畸後的不久，汪康年（1860-1911）便託羅振玉將新見支豐宜《曲目表》交與王國維：「錢某溪《曲目表》，不僅靜安，弟亦未見也。」「《曲表》收到，即示靜安。」¹²⁴ 然而此時《曲錄》已下板刻印，無法增補。王國維在草創《曲錄》時困難重重，不可不謂之艱辛：「此書可議

¹²¹ 本部分最早受 2019 年 2 月 19 日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任榮學兄轉述中山大學黃仕忠先生語的啟發，在撰寫過程中亦多得黃老師指點，特此致謝。

¹²²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3 號（1928 年 4 月），頁 92。

¹²³ 唐·毋煚：〈古今書錄序〉，《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46，頁 1965。

¹²⁴ 〈羅振玉致汪康年〉，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書店，2017 年），第 3 冊，頁 2921、2924。

處雖多，然大輅椎輪，創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¹²⁵

隨著眾多學者追隨靜安之志趣，戲曲研究日漸成為顯學；與此同時，既往不得見的戲曲文獻也復現於學界：「二十年來，治曲之風大起，公家私室，群力搜羅，向之淹沒不彰者，稍稍復出。」¹²⁶基於這一事實，《曲錄》的舛誤、遺漏便屢被學者提及，學界在獲益於該書的同時，批評的聲音也逐漸多了起來。

較早認為《曲錄》可以進一步完備的是王國維學術密友吳昌綬（1856-1924）。「晨風閣本」出版後不久，王國維便贈送了一部與吳昌綬：「《曲錄》感感，印價務請示下照繳。」¹²⁷在瀏覽一過後，吳氏旋指出該書尚可修改：「弟得暇當以朱筆為校讀一過，俾可修改，為公廣不朽之傳業。」¹²⁸不難看出《曲錄》自問世之日起，學界便持有了挑剔眼光，而批評在 1921 年前後達到了高潮。

本年陳乃乾從劉世珩處借得「玉海堂鈔本」，之後古書流通處便將此版《曲錄》收錄在《曲苑》內刻印流通。然而王國維卻始終對此事不知曉：「（顧頡剛）說他前些日子見王國維先生時，曾問過他。王先生說《曲苑》裏所刊的《曲錄》原是他的初稿，不知古書流通處在什麼地方鈔來。《晨風閣叢書》裏的一部，才是完成的稿子。」¹²⁹「曲苑本」一經問世便受到多方指責。鄭振鐸指出：「我所見的共有兩本，一是古書流通處影印的《曲苑》裏的本子，一是《晨風閣叢書》的本子。《曲苑》本無說明，疏略極多，不如《晨風閣》本遠甚。」¹³⁰胡

¹²⁵ 趙萬里：〈靜安先生遺著選跋〉，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 年），頁 326。

¹²⁶ 鄭騫：〈善本傳奇十種提要〉，《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5 年），下冊，頁 409。

¹²⁷ 〈吳昌綬致王國維〉，《王國維未刊書信集》，頁 184。

¹²⁸ 同前註，頁 196。

¹²⁹ 鄭振鐸：〈《曲錄》·讀書雜記〉（二），《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1 期（1923 年 1 月），頁 30。

¹³⁰ 鄭振鐸：〈《曲錄》·讀書雜記〉（一），同前註，頁 4。

適（1891-1962）也「曾見《曲苑》內所收《曲錄》二卷，甚不滿意」，¹³¹1923年春他特意購買了「晨風閣本」聊補心中遺憾。即便是十餘年後，吳曉鈴（1914-1995）在使用「曲苑本」時亦稱：「翻閱《曲錄》二卷，恨其過於簡略；今之學人如有重編之意者，余以為於補缺正訛之外，須錄卷數，標存佚，記版本，敘藏家；必如此方有用。」¹³²「曲苑本」使學界不再掩飾對《曲錄》的不滿，加之王國維又在1927年下世，此後戲曲學人便紛紛接踵靜安之遺志，輯補《曲錄》乃至重編一部古典戲曲總目的呼聲日漸高漲。

縱觀學界對《曲錄》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曲錄》沒有標明劇目的存佚與版本，其二《曲錄》缺少交代劇目情節，其三是內容存在疏漏與錯訛。然而細細追究起來，以當時之條件實不能過分責備王國維。胡適指出：「此書出版於宣統元年，已近十四年了。這十四年中，戲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們希望王先生能將此書修改一遍，於每目下註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¹³³杜穎陶（1908-1963）〈記玉霜移所藏鈔本戲曲〉更詳細羅列了在使用《曲錄》時的諸多不便，葉德均（1911-1956）〈曲目鉤沉錄〉也對重編《曲錄》提出了一些設想：

記錄雜劇傳奇的書，要以王國維的《曲錄》列舉的比較為最完備了。不過美中不足，還有三個缺點：（一）不曾把存佚注明。（但我們所希望的，還不僅是知道某書尚存，某本已佚而已，我們更希望得到一個指引，使我們曉得尚存的各種罕見本現在藏於何處。）（二）不曾把劇中情節敘述出來。（三）錯誤和遺漏。¹³⁴

¹³¹ 胡適：〈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34。

¹³² 吳曉鈴：〈讀曲日記〉，《吳曉鈴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冊，頁23。此條寫於1939年9月19日。

¹³³ 胡適：〈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頁537。

¹³⁴ 杜穎陶：〈記玉霜移所藏鈔本戲曲〉，《劇學月刊》第2卷3期（1933年3月），頁60。

戲曲書目從《錄鬼簿》起，至《曲錄》止，總計有八九種之多。其中能够集大成的僅有姚變《今樂考證》及王國維《曲錄》二種，在現在看來，這兩部書也只是戲曲研究初期的產物，其有待於增補，修訂，或重輯，是無待言的。任二北氏曾有〈《曲錄》校補〉一文，於王氏原書增訂頗多。但在曲籍大批發現的今天，「校補」之類仍然是不够，而是要重新輯錄的。鄭西諦先生似也有重寫《新《曲錄》》的企圖，惜僅成元雜劇的一部份。……理想中的《新《曲錄》》，不僅如胡適所希望註明存佚，還要：臚列諸種版本，作者事略，內容提要，同一題材諸本之演化，諸書評論及有關考訂之記載等等。而原書已佚有殘文存在的，也應該註明其所在。……至於取材，除了王氏原書所據的諸書以外，更要增入王氏所未能見到的曲目、曲選、戲曲選。而曲籍以外的諸書，除王氏所引書外，即詩文集、筆記、雜著等有關曲目的，也應在羅列之內。¹³⁵

與《詞錄》相同，《曲錄》不囿於個人所藏及目驗所及，凡可徵文獻皆悉數編入：「遇而廢之，不若遇而存之。」¹³⁶然而王國維並未像《詞錄》一樣標明存佚：「存佚未見，未敢頌言。」¹³⁷《曲錄》著錄的作家及劇目數量遠勝於《詞錄》十倍之多，這其中王國維目驗的只有《元曲選》、《六十種曲》，以及家藏總計三百餘種的劇目。尚有近三千種劇本，就連王國維自己也是通過其它戲曲目錄才得以窺見。¹³⁸回想早先王國維在編纂《詞錄》時的謹慎，與其挂一漏萬，不如不標明存佚。杜穎陶之語反映了胡適、葉德均等戲曲學人的普遍感受，但許多設想難以實踐。至於杜氏所言「使曉得尚存的各種罕見本現在藏於何處」，就更屬苛責靜安了。倒是鄭振鐸對《曲錄》多有回護：「《曲錄》有最為人

¹³⁵ 葉德均：〈曲目鉤沉錄〉，《大公報》第15版（1946年10月10日）。

¹³⁶ 王國維：〈詞錄·序例〉，頁2。

¹³⁷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70。

¹³⁸ 孫楷第：「王靜安先生撰《曲錄》，所注元曲版本，雖有《古名家雜劇》、《續古名家雜劇》、《元人雜劇選》、《元曲選》諸本，實則所見者只有《元曲選》一書，無他本也。」見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頁209。

不滿的一端，即於每書之下，不註存佚，但註『存佚』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二人之耳目，如何能周？一二地方的所藏，如何能夠代表各地的所有？……所以，所謂『註存佚』者，只不過是說明我們現在所見到及所見不到的是什麼什麼而已。」¹³⁹

其次，杜穎陶、葉德均還指出《曲錄》未敷陳劇作情節，這一設想當是受到《曲海總目提要》啟發。1928年，大東書局出版了董康主持的《曲海總目提要》，此書成為《曲錄》之後的又一部戲曲目錄學力作。學界也每每將其與《曲錄》相比：「近人中惟海寧王君靜庵《曲錄》六卷，亦推美富。所惜者各曲文字未及遍覽，時見紕誤，未若此書之詳贍也。」¹⁴⁰《曲錄》與《曲海總目提要》雖同屬戲曲目錄，但前者重在標舉綱目，後者力在概述戲劇情節，性質實有不同。

對於《曲錄》中的疏漏，晚年的王國維也沒有迴避。1924年6月，陳乃乾去信王國維談及自己校補《曲錄》的心得：

光宣之際曲本尚不見重於人，故發見甚少，大著《曲錄》適成於此時，自不能免漏略之病。然采摭搜討以成一家之言，則先生宣啟其端。今學者方奉此為南針，以研究劇曲。而先生乃欲聽其自滅，烏可得耶！去年胡君適之撰〈讀《曲錄》〉一文，以每目下未注明存佚為憾，似未窺見先生著書之體例者。近人立說，每好攻人之失而又不能糾正之，可歎也！乾頻年據知見傳本校改於《曲錄》書眉者幾數十條，今年獲觀盛氏藏本《樂府考略》，又補出數十條，稍暇擬錄成清本以求審定。乾意此書有裨於學者甚大，舊本既有漏略，則校補翻印為急務矣！先生以為然否？¹⁴¹

陳乃乾認為「校補翻印為急務矣」。王國維很快回信道：

昨奉手教，敬悉一切。拙撰《曲錄》不獨遺漏孔多，即作者姓名、事實

¹³⁹ 鄭振鐸：〈元明以來雜劇總錄序〉，《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頁925。

¹⁴⁰ 吳梅：〈曲海總目提要·序〉，頁2。

¹⁴¹ 〈陳乃乾致王國維〉，《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頁125。

可考者尚多。後來未能理會此事，故不願再行刊印。兄如能補遺正誤，並將作者事實再行蒐羅，則所甚禱也。¹⁴²

多年後的陳乃乾對此事亦有回憶：「當時靜安亦曾來信談及此事，謂：『拙著《曲錄》，當時甚不完備，後來久廢此事，亦不復修補。弟意此書聽其自滅，至為佳事，兄如能補遺正誤，並將作者事蹟再行蒐羅，則所甚禱也。』」¹⁴³王國維認為《曲錄》的「作者姓名、事實可考者尚多」，甚至於言「聽其自滅，至為佳事」，希望後來者能「補遺正誤」。雖然杜穎陶、葉德均等有關重編《曲錄》的設想多有不符王氏原書宗旨之處，也有即便是放在當今學界仍難以實現的地方，但正是一代代戲曲學人的步履蹣跚，才推動了古典戲曲目錄編纂理論、方法的進步。

縱然《曲錄》有著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它仍然是此期研治戲曲的案頭必備工具書。隨著民國初年大量既往不得見的戲曲文獻、戲曲目錄被披露，在尚無學者編纂新的戲曲目錄的前提下，採取評點的形式將新見戲曲文獻批註在《曲錄》上，這成為民國戲曲目錄學的一個頗值得關注的現象。而且在新見文獻積累到一定體量後，部分學者也開展了接續《曲錄》的工作。僅以筆者所知，這一時期的《曲錄》評點本有十種，續書亦有五種。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種，即吳梅批本，索書號 04387；鄭振鐸批本，僅存後四卷，索書號 16997。首都圖書館藏三種。許之衡（1877-1935）批本，索書號已 1243，朝華出版社影印之《曲錄》即以此為底本。¹⁴⁴馬廉（1893-1935）批本，索書號已 1244，首頁「隅卿讀書」「馬廉」朱文方印。此本是吳曉鈴捐贈與首都圖書館，當是馬廉故去後，所批《曲錄》歸入吳氏「雙楮書屋」。吳曉鈴批本，索書號已 1245，首頁鈐「曉鈴藏書」朱文方印。封面有毛筆題簽：「吾將下鄉，重檢書篋，見此舊物，即將永別，戀戀不捨。書中朱墨尤

¹⁴² 〈王國維致陳乃乾〉，《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562。

¹⁴³ 陳乃乾：〈人間詞話〉，《陳乃乾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頁 63。

¹⁴⁴ 王國維：《曲錄》（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 年 9 月）。

新，但至今一事無成，傷悲。一九五七，十一，廿三，放雲。」此批本當完成於1957年以前。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吳曉鈴採用紅筆過錄馬廉批校，後又用黑筆補入自己的增補，因而吳曉鈴批本是承馬廉批本而來。還有兩種批本藏於私人手中。朱希祖（1879-1944）批本，首頁鈐「朱希祖」朱文方印，2009年春見於中國書店「2009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1925年十二月，朱希祖偶然在書肆購得昇平署檔案與曲本，此後他多致力於戲曲文獻的搜輯與編目。至1932年南下中山大學，戲曲才淡出其研究視野，朱希祖評點《曲錄》當是在這一期間內完成。劉樹楷批本，¹⁴⁵僅存卷一、卷二、卷五與卷六，2019年夏先後現於「海王村古籍善本文獻專場」、「點滴第六〇九屆戲曲暨小說古籍拍賣專場」，此書後有劉氏款識：「廿八年七月五日過錄，卅日完竣。樹楷錄。」

日本也藏有三種《曲錄》批本。青木正兒（1887-1964）批本，名古屋大學「青木文庫」藏，索書號992.03。此本為1912年青木正兒在京都訪問王國維時由王氏所贈，書末有跋：「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初訪問王（國維）氏討論元曲的事，他贈送了我這本他的著作，（梁按，此處人名軼失）說這曾經是對我研究這門學問起了很大幫助的書。學校裏有一部分，然而至今未能入手，現在得到了甚是歡喜。沉思洞人。」¹⁴⁶日本明治四十五年即1912年，王國維留居京都，當年二月青木正兒拜訪王氏：「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余始謁王先生於京都田中村之僑寓。其前一年，余草《元曲研究》一文卒大學業，戲曲研究之志方盛，大欲向先生有所就教。」¹⁴⁷青木正兒得到王國維贈與的《曲錄》即在此期。倉石武四郎（1897-1975）批本，¹⁴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

¹⁴⁵ 劉樹楷，生平事蹟不詳，僅知其為劉修業堂弟，北平圖書館館員。

¹⁴⁶ 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0年），頁432。
蒙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陸洋女史代為譯出日文，特此致謝。

¹⁴⁷ （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頁1。

¹⁴⁸ 倉石武四郎，早年求學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著有《禮記疏考正》、《目錄學》等。

庫」藏，索書號 4165900，首頁鈐「倉石武四郎博士珍藏」、「東洋文庫研究所圖書」，黃仕忠《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輯收錄。1928 年 3 月至 1930 年 8 月，倉石武四郎先後得日本文部省、上野育英會資助留學中國。從倉石武四郎的《曲錄》批本看，其補充的劇目多是日本藏本，故這一工作應是在日本國內完成。八木澤元（1905-1977）過錄馬廉、趙萬里、倉石武四郎批本，¹⁴⁹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藏，索書號：K747/2-4。書後有八木澤元跋語：「今茲己卯之春，余訪倉石博士於京都也，提撕殷勤，無不至。余於是感歎久之，曰：不思名利，不別尊卑，惟學之好，洵不世出碩學也。偶聞夫子有王國維《曲錄》之馬廉、趙萬里、倉石三氏補注者，懇請借鈔之。季夏至歲末，乃終業，於是戲曲目錄之學始就緒矣。余雖不敏，潛心於曲學，以酬夫子洪恩云爾。昭和己卯臘月下浣書於烏城城下僑居。」¹⁵⁰昭和十四年（1939），八木澤元過錄了倉石武四郎批本。

除《曲錄》批本外，現存還有五部《曲錄》續書。朱希祖《續《曲錄》》，1926 年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室藏，索書號 SG3。朱希祖有序：「王靜安先生所撰《曲錄》，頗稱博洽，然亦有遺漏謬誤者。茲隨所見聞筆錄，以補其遺、匡其謬。以見創始者之不易而可貴，後繼者藉其成功，事半功倍。土壤之增泰山，細流之益河海，較之不增不益，固有間焉。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海鹽朱希祖記。」¹⁵¹任訥〈《曲錄》初補〉，連載於《國聞週報》1926 年第 43、44、45、46、49、50 期，第二年的第 2 期至 11 期。任訥〈《曲錄》初補〉自序：「昔海寧王靜庵先生有《曲錄》六卷，總宋金元明清五朝戲劇曲書之名，凡三千有餘。分別部居，考訂作者，注明版本，標明出處，閱者歎為藝林未有之盛業。」¹⁵²陳乃乾〈《曲錄》校補〉，載於《鑒賞週刊》1925 年第 9、10 期。

¹⁴⁹ 八木澤元，早年求學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文學科，畢業後任教於北海道預科大學、山形大學教授，著有《明代劇作家研究》。

¹⁵⁰ 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頁 433。

¹⁵¹ 朱希祖：〈續《曲錄》·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 1926 年民國稿本。

¹⁵² 任訥：〈《曲錄》初補〉，頁 2-4。

陳乃乾〈《曲錄》校補〉前「神廬讀書記」有言：「今年二月間，天津貽安堂書鋪有翻印《曲錄》之擬，王靜安先生貽書於乾，囑寫定《曲錄》校補，付貽安堂合刻，因取曩時校注於書眉者摘錄之，甫寫成『雜劇類』二卷。忽聞京友已借晨風閣原版抽印《曲錄》單行本，翻印之擬遂寢。余亦以校補無多，不欲亟為寫定，今錄於此，以希世之同好者補正焉。」¹⁵³另有馬廉《《曲錄》初補》，完稿於1930年，今不知去向。¹⁵⁴孫楷第《《曲錄》新編》現歸中華書局，擬收入「孫楷第文集」。

相較於與以「續」、「初補」、「校補」等為名目匡補《曲錄》，基於使用《曲錄》時的不便，以及新發現的戲曲文獻未能及時編目，一些學者還萌生了重編戲曲目錄的宏大志願，熱情最高的當屬馬廉、鄭振鐸、任讷（1897-1991）與趙萬里（1905-1980）。1931年夏得錢南揚（1899-1987）引薦，鄭振鐸、趙萬里與馬廉在寧波林集虛處訪得姚燮（1805-1864）大梅山館舊物《今樂考證》，趙萬里〈今樂考證·跋〉記：

二十年夏，我和鄭西諦先生從上海迂道赴寧波，赴四明訪書之遊。那時馬隅卿先生正在原籍養病。我們三人志同道合，想用整個力量將《曲錄》重新加以修正。因此想起南揚的話，同赴林集虛處訪問此書下落。五冊毛裝藍格的《今樂考證》，頓時呈現於我們眼前。才知道這是一部未曾完工的稿子，體例不盡邃密，所收劇曲的類別未必能多於《曲錄》，但頗有《曲錄》所失收的。隅卿與西諦即時有問鼎之意。……新資料的不斷發現，使我們愈覺得《曲錄》有從速改編的必要了。那時西諦的情緒最緊張，最熱烈，又邀我們到鎮江和任中敏先生會面。中敏致力於北雜

¹⁵³ 陳乃乾：〈《曲錄》校補〉，《鑒賞週刊》第1版（1925年8月3日）。

¹⁵⁴ 倉石武四郎在日記中記錄了有關馬廉《《曲錄》初補》的信息：「來薰閣送《《曲錄》初補》，隅卿先生物也，即托人抄寫。」「來薰閣送《《曲錄》初補》，中有錯亂處，竊疑遺失原書，惶恐甚，即驅車赴廠。」「《《曲錄》初補》抄完。」「作書報迷陽先生以抄完《《曲錄》初補》事，一歲宿債，得償其半矣。」（日）倉石武四郎，榮新江等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70、118、121、123。

劇與北散曲，歷有所年，自號曰「二北」以見志。曾在《國聞週報》發表過一篇〈《曲錄》補遺〉，重編《曲錄》的呼聲，可算是中敏首先提出的。因此我們有和他商榷合作的必要。……那時隅卿和我重編《曲錄》的興趣，還是相當濃厚。¹⁵⁵

《今樂考證》雖不完備，但卻有不少《曲錄》未載劇目。新材料的發現大大刺激了鄭振鐸等人重編《曲錄》的念想，為此他們特意造訪了任訥，後者早年曾發表過〈《曲錄》初補〉。鄭振鐸、趙萬里、馬廉與任訥重編《曲錄》的事情也確有推進。《申報》「1931年12月27日」刊登了一則公告：「《小說月報》1910年創刊，本報自從第十二卷革新以後，無時不在努力改進，期能發揚光大我們的新文藝。現當第二十三卷開始的時候，謹將本卷特點略述於後，以快先睹。《曲考》：此為任中敏、馬廉、趙萬里、鄭振鐸四位的合作作品，可以增補王國維氏《曲錄》之不足，每書後詳注存亡及存處，尤為有用。」¹⁵⁶公報中所言《曲考》當即為重編《曲錄》之名稱。《小說月報》創辦於宣統二年（1910）七月，然而其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則一直到了1921年，之後茅盾（1896-1981）、鄭振鐸主編此刊長達十年。殊為可惜的是，該報在1931年12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號後便終刊，第二十三卷的新年號不幸毀於淞滬會戰，四人纂輯《曲考》一事也無下文。不過他們的這一倡議還是在學界產生了影響，唐圭璋（1901-1990）曾致信陳乃乾：「曩者聞友人任中敏言，先生亦有考訂《曲錄》之意，現不知已有成稿否？後知趙萬里、鄭西諦諸先生亦有合編《曲志》之議。自中敏拋荒舊業，成議久寢。璋意際茲時會，《曲志》亦大可重編。自王靜安後，中敏續補頗多，璋亦有補入補目之稿，今姚梅伯稿發現，領域更廣。今彙集諸種，並非甚難之事。」¹⁵⁷唐圭璋所說《曲志》當為《曲

¹⁵⁵ 趙萬里：〈今樂考證·跋〉，《趙萬里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2冊，頁308-313。

¹⁵⁶ 〈公告〉，《申報》第9版（1931年12月27日）。

¹⁵⁷ 〈唐圭璋致陳乃乾〉，收入《共讀樓存札——陳乃乾友朋書信》，《嘉德四季第42期拍賣會圖錄》，編號：1188。

考》。對於此事，杜穎陶也有回憶：「記得在前年曾經聽到一個消息，說是有幾位藏曲家，要聯合起來做一部很完美的曲錄，但直到如今，這消息還祇是一個風聞。」¹⁵⁸ 從唐圭璋、杜穎陶的回憶看，鄭振鐸、趙萬里、馬廉與任訥重編《曲錄》的工作終究還是沒有成行。

在上述四人中，趙萬里對重編《曲錄》的意願最為強烈。趙萬里，字斐雲，號雲庵、舜庵，浙江海寧人。1925 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後得吳梅引薦，至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王國維的助教。1927 年王國維去世後，他全力編纂恩師遺作與年譜。1929 年又經陳寅恪（1890-1969）介紹，趙萬里赴北平圖書館任職，此後歷任中文採訪組、善本考訂組組長。早在 1928 年，北京圖書館承梁啟超（1873-1929）指導曾編有一部戲曲目錄：「宋金以來，院本雜劇及元明清之傳奇等，曾經海寧王氏編有《曲錄》一書，然尚多遺漏。今特托專家廣為蒐補，共得四千五百五十三種，視王錄增加七百餘種。惟此項書存佚極難確定，除目錄知為確存者注明刊本外，餘只列其目，以待蒐訪。此部分書須要解題者，雖不多，然亦有數十種應加說明者。今方在屬稿未定中，先將目錄兩冊呈閱。」¹⁵⁹ 兩冊的《集部詞曲類曲本之屬》初稿今已不知下落。在鄭振鐸、任訥、馬廉重編《曲錄》一事宣告廢寢後，趙萬里、孫楷第（1898-1986）等北平圖書館館員開始繼續推進重編《曲錄》的工作。此時趙萬里在清華大學講授有「《曲錄》以前諸家曲目，及重編《曲錄》之方法」，¹⁶⁰ 他當有初步的編纂設想與方法。終於在 1933 年至 1937 年，重編《曲錄》成為了趙萬里領導下的北平圖書館善本考訂組、編目組的重要工作之一：

《元明清戲曲總目》：就鍾嗣成《錄鬼簿》、賈仲明《續錄鬼簿》，參照最近發見之材料，詳加箋注成為底本，再進行編纂，現在箋注中。¹⁶¹

¹⁵⁸ 杜穎陶：〈記玉霜簪所藏鈔本戲曲〉，頁 60。

¹⁵⁹ 《中國圖書大辭典編纂處報告》，《北京圖書館第二年度報告》（1927 年 7 月至 1928 年 6 月），頁 49。

¹⁶⁰ 趙萬里：〈目錄學十四講綱目〉，《趙萬里文集》，第 1 冊，頁 386。

¹⁶¹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3 年 7 月至 1934 年 6 月），頁 19。

重修《曲錄》：仍繼續以前之工作，凡現存各曲之版本，經詳加調查者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孔德圖書館、戲曲音樂研究院、王孝慈先生遺書及傅惜華先生藏書，此後加以整理即可成書。¹⁶²

重修《曲錄》：關於資料之搜集及調查已大致完畢，平京滬杭公私藏書均已查閱。至曲家事跡，本年度特在元明人集百餘種內節鈔，有關資料數百條，其卡片已就曲目分類完畢。但先後次序尚須重檢排定，而新得之資料亦須增補，稍遲當可寫定。¹⁶³

趙萬里起初以《錄鬼簿》、《續錄鬼簿》以及新近發現的戲曲文獻為基礎進行編纂，並稱之為「元明清戲曲總目」，至1935年這項工作始以「重修《曲錄》」的名義開展。與《曲錄》不同，北平圖書館此番走訪了眾多公共圖書館及藏曲家，這一工作也彌補了胡適等人對《曲錄》未標明存佚的遺憾。然而從目前信息來看，重修訂的《曲錄》並無文本傳世，故不詳此事究竟進展如何。倒是孫楷第撰有《《曲錄》新編》，不知此書是否即為北平圖書館重修《曲錄》之成果。

評點、接續《曲錄》是民國戲曲目錄學史的重要現象。後來者或在《曲錄》的基礎上輯補新文獻，或修訂、豐富《曲錄》已有內容，這使校補《曲錄》的工作朝著精密化方向發展，推動了民國戲曲目錄學發展。《曲錄》對後世戲曲目錄的影響廣泛且持久，直至傅惜華「中國古典戲曲總錄」出版，戲曲學人對《曲錄》的依賴方才有所改變。¹⁶⁴

¹⁶²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頁13。

¹⁶³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頁12。

¹⁶⁴ 傅惜華《中國古典戲曲總錄》原擬定為8種，即《宋金元雜劇院本全目》、《宋元戲文全目》、《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清代傳奇全目》、《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書目》。然由於各種原因，僅出版有《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清代雜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四種。

六、結 語

與〈三十自序〉中表露的「何敢因前者（詞學）之成功，而遽冀後者（曲學）乎」的踟躕不前不同，¹⁶⁵至《曲錄》完稿，王國維萌生了「非徒為考鏡之資，亦欲作搜討之助」的學術自信。¹⁶⁶這一心態在之後數年內愈發堅定：「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¹⁶⁷王國維以材料搜集、觀點創獲為自己治曲的最大心得，《曲錄》毫無疑問起到了道夫先路之功。《曲錄》的編纂過程、指導思想不僅可見王國維曲學思想精確性與細密化的形成過程，更可以感知其學術理路之變遷，及其闡釋古典戲曲美學的心力。

趙萬里曾說：「先生之治一學，必先有一步預備功夫。」¹⁶⁸作為涉足戲曲研究的第一步，《曲錄》承擔了戲曲文獻的收集工作。通過編纂《曲錄》，王國維熟悉了相關材料，這為此後相關研究的開展打下了基礎。如《曲錄》引王世貞《藝苑卮言》「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¹⁶⁹至《戲曲考原》開篇便記：「戲曲一體，崛起於金元之間。」¹⁷⁰稍後的毛汶（1905-1989）評價「《宋元戲曲史》與《曲錄》，實為姊妹篇」。¹⁷¹《宋元戲曲考》第十章「元劇之存亡」，王國維再「從《錄鬼簿》之次序，並補其所未載者」成一敘錄，¹⁷²其材料便是出自《曲錄》

¹⁶⁵ 王國維：〈三十自序〉，《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22。

¹⁶⁶ 王國維：〈曲錄·自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70。

¹⁶⁷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

¹⁶⁸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頁179。

¹⁶⁹ 王國維：《曲錄》（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卷四，頁7上。

¹⁷⁰ 王國維：《戲曲考原》（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頁1上。

¹⁷¹ 毛汶：〈補證王靜安先生金元院本考二事〉，《大公報》第九版（1935年11月22日）。

¹⁷²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87。

卷二。《宋元戲曲考》與《曲錄》的因襲關係，由此可見。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認識論形成上，王國維通過編纂《曲錄》不斷糾正此前一些偏頗看法，並對之後成熟觀點的形成起到啟迪作用。如〈三十自序〉描述元曲：「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調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¹⁷³《人間詞話》更是拋出「曲則古不如今，元曲誠多天籟，然其思想之陋劣，佈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嘔飯。至本朝之《桃花扇》、《長生殿》諸傳奇，則進矣」的觀點。¹⁷⁴然而通覽《曲錄》，王國維用力最多的是元曲。在此部分，王國維著重論證「意境」作為元曲核心審美特徵的理論內涵與體貌呈現。至《宋元戲曲考》，王國維進一步認為「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¹⁷⁵積極肯定元曲的精妙所在：「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一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¹⁷⁶1925年4月，當青木正兒向王國維吐露「明以後尚無人著手，晚生願致微力於此」時，王國維冷然直言「明以後無足取，元曲為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也」，¹⁷⁷更是對自己早年否定元曲的再次推翻。十餘年內王國維有關元曲的態度出現巨大變化，其拐角便出現在編纂《曲錄》時。

《曲錄》不僅有集歷代戲曲目錄學的集大成之功，更對後世著作起到率先垂範的作用。《曲錄》確立的戲曲目錄學體例多為後來者承襲，如傅惜華「中國古典戲曲總錄」在劇目排序上，便繼承「晨風閣本」「以現有流傳版本者置於最前，次及殘存佚文者，而以全佚存目者為殿」的範式。¹⁷⁸王國維「以目證目」的方法也被諸家沿用，鄭騫《善本傳奇十種提要》（1938）、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1982）、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1997）皆是如此。後

¹⁷³ 王國維：〈三十自序〉，《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22。

¹⁷⁴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172。

¹⁷⁵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106。

¹⁷⁶ 同前註，頁105、126。

¹⁷⁷ （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頁1。

¹⁷⁸ 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例言〉，頁2。

人也每每將新近問世的戲曲目錄比及《曲錄》，如「較之姚、王兩氏著錄，增出二千六百餘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又可得千有餘目」（〈《曲錄》初補〉）。¹⁷⁹誠然，後出目錄著錄的劇目數量勝於《曲錄》，但體例卻難逃《曲錄》確立的軌範。與之同時，「以史治曲」是《曲錄》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如孫楷第所言：「大儒如王靜安，以純然經師的態度作了一部不朽的《宋元戲曲史》，又以純然史家的態度作了一部有價值六卷的《曲錄》。」¹⁸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樂府考略》諸書雖然可證曲史，但著作自身的文本形態卻是片段式。《曲錄》徵引大量文獻，加上王國維對劇目進行的時間脈絡梳理，這使此書成為了一部以劇目呈現為體貌特徵的「曲史」。「以史治曲」也成為驅使近代古典戲曲研究轉型的關鍵。

在王國維的戲曲研究中，文獻考據與理論思考是一併進行。這從《曲錄》兩易其稿的編纂過程，以及書中體現的對戲曲文體特徵、審美價值的思考即可窺見。《曲錄》雖然揭開了王國維戲曲研究的序幕，但無論是該書的體例，亦或資料搜檢、文本草擬，都縈繞於王國維的詞學研究中。尤其是王國維借用了其詞學研究中成熟的「意境」理論，使曲史線索與審美批評一併隱匿在了《曲錄》的文本中。民國學術界針對《曲錄》的批評、評點及續書，不僅是民國戲曲目錄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現象，相關討論也推進了此後戲曲目錄的編製。王國維欲提振戲曲於中國文學地位的使命感也貫穿在《曲錄》的編撰全過程，這對於古典戲曲學科的建立與推動具有重要學術史意義。

（責任校對：王誠御）

¹⁷⁹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例言〉，頁1。任讷：〈《曲錄》初補〉，頁2-4。

¹⁸⁰ 孫楷第：〈輯雍熙樂府本西廂記序〉，《圖書館學季刊》第7卷第1期（1933年3月），頁115-12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元·鍾嗣成：《錄鬼簿》，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冊。
- 元·鍾嗣成：《錄鬼簿》，黃仕忠主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2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影印東洋文庫藏王國維鈔本，第29冊。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冊。
-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3冊。
- 明·呂天成著，吳書蔭校注：《曲品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明·徐復祚：《曲論》，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4冊。
-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
- 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6冊。
- 明·邱濬：《伍倫全備記》，明世德堂刊本。
- 清·高奕：《新傳奇品》，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6冊。
- 清·李漁：《閒情偶寄》，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7冊，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清·黃丕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7冊。
- 清·支豐宜：《曲目新編》，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9冊。
- 清·無名氏：《傳奇彙考標目》，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7冊。
-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書店，2017年。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王 鋼：《校訂錄鬼簿三種》，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王國維：《曲錄》，清稿二卷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
- 王國維：《曲錄》，清鈔二卷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現藏上海圖書館善本室。
- 王國維：《曲錄》，清稿六卷本，宣統元年（1909年）五月。
- * 王國維：《曲錄》，《晨風閣叢書》六卷本，宣統元年（1909年）。
- 王國維：《曲錄》，吳梅批校《晨風閣叢書》六卷本，宣統元年（1909年），現藏首都圖書館善本室。
- 王國維：《曲錄》，馬廉批校《晨風閣叢書》六卷本，宣統元年（1909年），現藏首都圖書館善本室。
- 王國維：《曲錄》，鄭振鐸批校《晨風閣叢書》四卷本，宣統元年（1909年），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室。
- 王國維：《曲錄》，吳曉鈴批校《晨風閣叢書》六卷本，宣統元年（1909年），現藏首都圖書館善本室。
- 王國維：《曲錄》，古書流通處《曲苑》石印二卷本，1921年。
- 王國維：《曲錄》，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年。

- *王國維：《詞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 王國維：《戲曲考原》，宣統元年（1909）《晨風閣叢書》本。
- 王國維著，房鑫亮主編：《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
- 王國維著，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主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
- 王國維撰，徐德明整理：《王國維「人間詞」「人間詞話」手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王國維著，馬奔騰主編：《王國維未刊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
- *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
- 〈晨風閣叢書第一集出售啟〉，《國學萃編》第20期（1909年10月）。

二、近人論著

- 《中國圖書大辭典編纂處報告》，《北京圖書館第二年度報告》（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
- 〈公告〉，《申報》第9版（1931年12月27日）。
- 王瑜瑜：《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
- 毛 汶：〈補證王靜安先生金元院本考二事〉，《大公報》第九版（1935年11月22日）。
- 任 訥：〈《曲錄》初補〉，《國聞週報》第3卷第43期（1926年11月）。
- 朱希祖：《續曲錄》，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1926年民國稿本。
- 朱夏君：《二十世紀昆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杜海軍：《中國古典戲曲目錄發展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杜海軍：《古代戲曲目錄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
- 杜穎陶：〈記玉霜簪所藏鈔本戲曲〉，《劇學月刊》第2卷3期（1933年3

月)。

吳曉鈴：《吳曉鈴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佛 雛：〈《人間詞話》手稿補校後記〉，《揚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1987年10月）。

吳 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胡 適：《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苗懷明：《二十世紀戲曲文獻學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倪 莉：《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綜論》，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

唐圭璋：〈唐圭璋致陳乃乾〉，收入《共讀樓存札——陳乃乾友朋書信》，《嘉德四季第42期拍賣會圖錄》，編號：1188。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

孫楷第：〈輯雍熙樂府本西廂記序〉，《圖書館學季刊》第7卷第1期（1933年3月）。

韋 力：《失書記·得書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梁啟超：〈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序〉，《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年4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

陳乃乾著，虞坤林整理：《陳乃乾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陳乃乾：〈《曲錄》校補〉，《鑒賞週刊》第1版（1925年8月3日）。

傅惜華：〈綴玉軒藏曲志·序〉，《綴玉軒藏曲志》，北平：傅惜華鉛印本，1934年。

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 * 閔定慶：〈探索王國維詞學體系的另一個維度——《詞錄》與王國維「為學三變」的文獻學取向〉，《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2007年3月）。
- *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 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彭玉平：〈〈靜庵藏書目〉與王國維早期學術〉，《復旦學報》2010年第4期（2010年7月）。
- 彭玉平：〈王國維《詞錄》考論〉，《文學遺產》2010年第4期（2010年7月）。
- 黃仕忠：《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黃仕忠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
- 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董 康：《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葉德均：〈曲目鉤沉錄〉，《大公報》第15版（1946年10月10日）。
- 趙萬里著，冀淑英等整理：《趙萬里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年4月）。
-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年4月）。
-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 鄭振鐸：〈《曲錄》·讀書雜記〉（一）、（二），《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
-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鄭 騫：《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5年。
- （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日）倉石武四郎，榮新江等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u, H.-J. (2015). *Zhongguo gudian xiqu mulu fazhan shi*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re catalogu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Min, D.-Q. (2007). Tan suo Wang Guo-wei ci xue ti xi de ling yi ge wei du [A probe into a different angle of view about the ci theory system of Wang Guo-wei]. *Journal of Tsing Hua University*, 2, 97-104.
- Peng, Y.-P. (2011). *Renjian cihua shuzheng* [The explanation and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Ren jian ci hua]. Beijing: Zhonghua.
- Peng, Y.-P. (2015). *Wang Guo-wei cixue yu xueyuan yanjiu* [A study of Wang Guo-wei's ci studies]. Beijing: Zhonghua.
- Wang, G.-W. (1909). *Qǔlu* [The catalog of qǔ books]. Collected in *Chen-feng ge congshu* [The Morning-Wind Pavilion series]. (Original boo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Wang, G.-W. (2003). *Ci lu* [The catalog of ci books]. Beijing: Academy Press.
- Wang, G.-W. (2010). *Wang Guo-wei quan 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ang Guo-wei's works].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 Wang, G.-W. (2010). *Wang Guo-wei wei kan lai wang shuxin ji* [A collection of unpublished letters from or to Wang Guo-wei] (B.-T. Ma, Ed. & Annot.).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Zhong, S.-Ch. (1959). *Lu gui bu* [The book of ghosts]. Beijing: 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 Zhu, Q. (1959). *Tai he zheng yin pu* [Northern qu scores]. Beijing: 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